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刘邓挥兵战上党

第十二册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难忘的故事

蒋介石三电飞延安，毛泽东毅然闯虎穴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无条件投降了。然而，此时的局势则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当人们正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了中国共产党。

其时，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到了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

面对此情蒋介石当然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于是，他在11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一贯善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及时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这里，毛泽东以他那极具历史穿透力的目光，已经预测到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军事走势。

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因为要将整个神州大地置于蒋家王朝的统治之下，是蒋介石既定的战略目标，也是他一生的孜孜追求。但此时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就其外部条件而言，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就其内部条件而言，蒋介石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于是，蒋介石玩起了和谈的把戏，在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拍来了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延安广播电台在深夜零时收到这一电报后，机要室的工作人员立即用电话通报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次日凌晨，叶子龙将蒋介石的电报呈于毛泽东。

对于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洞若观火的毛泽东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的狡诈所在，他笑呵呵地对叶子龙说：

“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对于蒋介石发出的第一封“和平”邀请，毛泽东决定给他来个虚晃一枪，避实就虚，8月16日，他回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以来总司令名义致蒋——编者注）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铄

1945年8月16日

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邀请电，针对朱总司令日午电进行辩解，并以盟军司令部的命令为借口，倒打一耙：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寄

1945年8月20日

毛泽东仍然避实就虚，于22日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养
1945年8月22日

蒋介石仗恃兵力超过中央，又有美英撑腰，攻势咄咄逼人。面对蒋介石气势汹汹的架势，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由于这时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国际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日益加强；由于蒋介石集团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它调兵有困难，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并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日夜思考和研究对策的同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心里也像压着块重重的石头。为了弄清敌人的真正意图，这位著名的情报专家果断决定：日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从中捕捉信息；同时指示边区交际处长金城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故意泄露一点“情报”，诱使他们电告重庆，以便破译密电码。李克农这一招果然奏效，当晚便监听到了敌台的波长和呼号……限于当时的条件，密码二、三天内很难破译，于是，李克农又派遣“高手”，从敌人手中智取了密电码。

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摆在了李克农的面前。他不放过每一个字，认真分析研究后认为：蒋介石断定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蒋介石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作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正基于此，重庆受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在邀请电发出后便刊登了蒋介石的谈话，称：“国家的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

李克农火速将这些情报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看着中共领袖毛泽东两封避实就虚的回电，再联系到近期各特务机关发回的毛泽东不敢到重庆的情报，蒋介石认准毛泽东有懦怯之意，自己假和谈一着是绝妙之策，越发得意忘形起来，益欲先发制人，又致毛泽东一电，显得真诚备至，状不可待：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1945年8月23日

毛泽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于 24 日回电答复：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1945 年 8 月 24 日

26 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

“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妥协。”

接着，毛泽东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1945 年 8 月 28 日上午，延安万巷空城，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纷纷来到简陋的延安机场，为毛泽东送行，许多人泪雨纷纷，低声抽泣，既是为毛泽东不避凶险拯救人民的精神所感动，也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上午十一时许，毛泽东踏上弦梯，潇洒地向人群挥手告别。

重庆谈判，毛泽东谋高一筹

1945 年 8 月 28 日下午 3 时 27 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除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外，还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轰鸣声中，于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名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

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山洞林园。第二天，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战场上已厮杀多年的老对手，坐在一起，进行了第一次商谈，并确定了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30日晨，披着山城的晨雾，沐着火红的霞光，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驱车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00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4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老百姓的要求。”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3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一批批地来访客人很不方便。为此，力主国共和谈的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到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但毛泽东一直自如地操纵着谈判的权柄。

由于蒋介石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及其幕僚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

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2日晚、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其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在后来曾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9月21日晚，一向偏袒国民党的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

“中央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

赫尔利这些话，无疑是最后通牒式的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毛泽东从容不迫，用八个字来回答：

“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接着，毛泽东向这位老外阐明中共的主张：

“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毛泽东的话不愠不火，柔中带刚，赫尔利发觉，自己，连同蒋介石在内，在谈判桌上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10月8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

这时，毛泽东信步从楼上走下，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双十协定》签字两个多小时后，蒋介石身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腰佩短剑，亲到桂园拜会毛泽东。

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驱车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全国瞩目的国共谈判，由于共产党人的诚意，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果，暂告一段落。

谈判期间，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或者各解放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的恢复；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政府军队 1：6 的比例，缩编为 24 个师或至少 20 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在军队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拖延甚至陷于僵局。

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一党的武力政权”与现代民主统一的国家不相容。

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以有力的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周恩来说：“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

在 40 多天时间的谈判中，中共让出了 8 个解放区。国民党也作了某些让步，例如：国民党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承认了中共之合法地位，惩治汉奸和侵华战犯等。这说明：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问题，也就是有关解放区、军队问题上未有达成任何协议，而谈成的东西，也是纸上的东西较多，但还是有些具体成果的。

《双十协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重庆谈判取得的主要成就。谈判达成协议的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选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解决。

《双十协定》的签定，表明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大大提高了中共在国际、国内的威望。

一份很有见地的电报

八年抗战，黄克诚统帅新四军三师转战苏北，历经千百战，歼敌 10 万余，3 师也由不足 2 万人发展到 7 万余人。

抗战胜利了，有些人产生了喘一口气的思想。但是，黄克诚却看得深远得多。他认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假意同我们和谈，国内形势是“和战不定”。而我们党领导的地区还分散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南沿海，没有联成大片的战略根据地，这是十分不利

的。他决定，立即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响起来了，电波越过崇山峻岭，飞往延安——

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目前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大别山、黄山、天目山、陕南等），防我向其背后挺进。估计国民党军队到达指定之城市、交通要道之后（华北、华东），仍将在敌人掩护下构筑铁路封锁线，甚至纵深封锁线，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图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二、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大，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伪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根据地联系得很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三、在上述情况下，目前我们方针约有下面三个：

1. 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
2. 有利基础上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
3. 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有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

四、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永远不会放松我党我军）。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以利进行长期斗争。

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 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2. 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对该地区国民党军队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和太行全部。
3. 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待敌伪缴枪之后，在济、徐、胶，徐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 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人到6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这是一份有很见地的电报。

几天以后，中央发出指示，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向北要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向南要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这是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以后的人民解放战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9月底，党中央下达命令，命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主力3.5万多人，迅速从盐阜区开往东北。

东北，又一场新的斗争在等待着黄克诚。

刘邓挥兵战上党

上党是山西省东南地区的故称。由于那里地势高，古来说是“与天为党”，所以称上党。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出命令，限令敌伪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出全部武装。蒋介石却发出反动命令，命令我18集团军（八路军）就地停止待命，不许收缴日伪的武器；同时命令各地敌伪“维持地方治安”。土皇帝阎锡山向我晋东南解放区大举进犯，8月21日侵入长子，23日侵入屯留、长治，25日侵入壶关、潞城、襄垣。

敌占上党，用意颇恶。从整个战局看，蒋介石企图掠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并以此迫使我党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更大的让步。从局部看，阎锡山妄想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然后把我两根据地内的主力部队逼到山区消灭。

1945年8月25日，刘、邓首长回到太行，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十分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揭露了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日伪勾结，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的阴谋。

然后，刘伯承部署上党战役：

“要保持人民的既得权利，除了打垮反动派的进攻外没有别的出路。而上党战役，我军在战略上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沿平汉线、同浦线两个方面的进攻。平汉线是南北交通干线，我们一定要控制住。上党的敌人如不迅速予以消灭，待国民党主力北上时我军将腹背受敌。如果不幸出现这种局面，那么，给以后战局所增加的困难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必须首先歼灭上党之敌，尔后向平汉线挺进。上党之战必须打赢，否则以后的文章很难做好。在战术上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必须集中兵力打有准备之仗，打运动战、歼灭战。针对敌人孤军深入、分散守备的弱点，我们要避实击虚，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敌军出援，充分发扬我军的长处，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邓小平政委指出：

“毛主席把蒋介石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形象地比做抢夺人民的‘桃子’，桃树是人民栽的，水是人民浇的，国民党拿着刀来抢桃子，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一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人民战争开始了。

襄垣位于长治北 90 华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地方部队和民兵于 8 月 22 日就进驻襄垣县城。3 天后，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翟品三率阎军和收编的日伪警备队等 1000 余人，由屯留出发，攻占了襄垣。

决不能让敌人把人民到手的果实抢去。刘、邓首长决定于 8 月 31 日夜发动攻击。13 团从南关攻，34 团从西关攻。13 团早有准备，全力以赴挖了 100 多米的地道，直通城墙下，利用一个棺材装满炸药运到了城底下，准备炸城墙。

31 日晚上 6 点钟，攻城开始了。

午夜 12 点，襄垣县全城解放。我军歼灭敌 1 个大队，1 个保安团，活捉了敌县长闻家言及保安团长和大队长等 400 余人。

从 10 日至 18 日，仅仅 8 天时间，我军又解放了屯留、壶关、潞城、长子四座县城。

9 月 18 日，刘伯承司令员下达命令：“我已完成上党战役初步任务，攻占襄垣、屯留、长子、潞城、壶关五城，消灭上党之敌三分之一以上，使长治之敌陷入层层包围之中。……我决以勇猛速决之战夺取长治，彻底全歼侵入上党之敌。

从这天起，我军开始实施上党战役第二步计划——夺取长治城。

我各路部队包围长治城以后，经过几天充分准备，于 24 日开始对长治进行猛攻。战事首先从城南五马地区开始。守敌 37 师凭借制高点琉璃阁拚死挣扎。经过激战，我军攻占南关后，平顺民兵放火焚烧了琉璃阁。随后，我交通壕即延伸到长治城根。

25 日，继我军攻取南关之后，太岳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下北关。守敌 19 军军长史泽波，在我军南北夹攻下，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命令 68 师拚死夺回北关。经一天激战，毫无进展。于是，又改派其第 37 师再次争夺，史泽波亦亲临指挥。37 师将迫击炮放到城墙上，居高临下，轰击北门外护城河附近的民房。在硝烟弥漫中，敌师长杨文彩率一个团冲出城外，与我军逐院争夺。结果，敌人虽然暂夺回了北关，但其伤亡甚众，仅受伤的连长就有七八个，军长史泽波亦险些被炸弹炸死。

正当我军猛攻长治之际，阎锡山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奉阎锡山命令率两万人，驰援史泽波。他们 27 日到达沁县后，日夜兼程南下。我军如继续攻城，援敌从背后赶来，我长治北郊部队，就有被吃掉的危险；如放弃攻城，则前攻尽弃。

面对两难选择，刘、邓首长自省破敌之策，当机立断；变攻城为围城打援。

于是，刘邓命令：

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决死队第 1 旅全部及石（志本）于（一川）支队为攻城部队，继续佯攻长治城，吸引阎军第 83 军向长治急援；

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第 2 支队（缺 30 团）、第 4 支队及 17 师为打援之右翼队；

陈赓指挥 386 旅及太行第 3 支队为打援之左翼队，钳击援敌；

30 因为独立支队，由北尾击南援之敌，堵住它的退路。

阎军援兵沿白晋公路长驱南下，9 月 30 日，忽然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至屯留的大路向南挺进。

敌变我变，刘邓立即变更部署，改在公路两侧钳击敌援军。而以 17 师和独立支队尾击援敌。

10 月 2 日，我军主力预期遭遇敌援军于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至进道上一线。我军遵刘邓之计，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两翼迂回，同时尾敌前进部队向南展开攻击。

襄垣县和屯留县之间，有一脉海拔 1264 米的山岭。制高点有三座鼎足对峙的山峰，这就是上党战役主要战场之一的老爷山（岭）、磨盘山（磨盘嶂）和五赞山（关上）。在白（圭）晋（城）公路未修通之前，从太原到长治的交通大道就是由五赞山之间通过的。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冲。明代洪武、正统年间，曾在五赞山之阳设巡检司。

我军将敌人合围于老爷山，磨盘山地区。敌人扼守磨盘山、五赞山和老爷山等制高点，企图利用险要地形与我军决战。

10 月 3 日，我各路大军向敌援兵发起猛攻。

10 月 5 日黄昏，敌人突围北窜。逃敌脱离工事后，遭我各部队的截击分割，兵无斗志，仓惶逃命，溃不成军。这时，我军和民兵都冲向山岗和原野，奋起捕捉俘虏，到处高喊着“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口号。

此时此刻，枪声、炮声、人喊马嘶声，汇成一首壮观的胜利交响曲，震撼着远山近谷，山鸣谷应。

6 日下午，阎锡山指派其得力于将杨诚率省联军到榆林村。彭毓斌命令杨掩护各部队沿大道回沁县。为了迷惑我军，敌大部队佯向南进，辎重和指挥机关向沁县北逃。此时，敌 13 军已被我军打得溃不成军。

刘、邓首长马上识破了彭毓斌佯向南进实为北逃的诡计，命令太岳纵队追赶并超过敌人，以便围歼。我 20 团连夜冒雨爬山，抄小路急进，当晚 10 时到达漳河西岸土落村。1 营过河守渡口，2、3 营修整依山工事。

7 日，两万多逃敌被我军堵截在土落村山前公路两侧的洼地上。逃敌一连八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我 20 团坚守阵地，赢得了时间。傍晚，我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分别从左、中、右三方面围拢上来，将逃敌装进口袋。敌军除 2000 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炮兵司令胡三余，师长郭溶、张宏、李佩膺等高级将领，均被我军俘虏。

我军土落村截击战斗的胜利，使被困在长治城里的史泽波慌了手脚，立即向阎锡山谎报没有粮食，要求下令突围。阎复电令其撤回临汾。当天夜晚，史率部突围，乘大雨浓雾西逃，长治城宣告解放。

11 日拂晓，我军包围圈逐渐缩小。下午 3 时，逃敌全部被我军压缩在桃川村及其周围。12 日晨 6 时，我军发起总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逃敌除先头少数溜掉外，1 万余人被歼，共俘敌官兵 5000 余人，19 军军长史泽波也被俘获。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上党战役，我军解放了襄垣、屯留、壶关、潞城、长子、长治等 6 座县城，歼敌 3.5 万余人，缴获大炮 72 门，美国火箭炮 1 门，机枪 2200 余挺，长短枪 1.6 万余支，及许多其他军用品。

漂亮的阻击战

解放战争初期，定陶战役中曹县南面的阻击战，我军某部 14 团以少量的

兵力和劣势的武器装备，打退了兵力比我多七、八倍，武器装备比我优良的增援敌兵，有力地配合了大杨湖（定陶以西）我主力聚歼蒋军。

8月底的一天，团长申绍英同志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党员，传达了这次作战任务。他说：“我们团要把来自商邱的敌55师，以及柳河方向的敌暂编4纵队2支队，阻击在曹县以南，不让他们增援被我主力围困在大杨湖的敌人，时间是3天，顶住敌人就是胜利。这三天当中，我们给敌人规定的行程是：每天不得超过20华里”。在谈到具体打法时，申团长说：“面对众多的敌人，我们要灵活机动地打，有计划地打，有计划地撤，一定要事先选好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作依托。我们的部署是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仲堤圈大堤；第二道是土山集；第三道是曹县护城堤……”

9月3日，营连分别部署后，立即进入阵地。2营首先奔赴第一道防线仲堤围南面黄河大堤。

战斗第二天拂晓打响。敌人开来许多炮车，阵地上尘土飞扬。2营打退敌人的冲锋后撤到土山集。

傍晚，团部命令2营留下5连在阵地上监视敌人2小时，其余全部撤出，转移到第三道防线——曹县护城堤，准备阻击敌人的大规模进攻。

这护城堤，是曹县城墙外的一道土堤。堤高约二丈有余，堤宽一丈多点。它像一道天然屏障，横卧在东西之间。地形对我十分有利。

第三天天刚亮，敌人的大队人马，就从曹县的南面和西南面向我防线运动。才吃罢早饭，便听到前边的炮声。过了不到半小时，敌人的各种炮都开火了。霎时，我一、二道防线被浓黑的硝烟所覆盖。

敌人炮击了约莫一小时，炮声还没有停，轻重机枪声又响了。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张牙舞爪地向我阵地扑来。一个军官还嚎叫着：“要抓活的！”营长陈光荣同志立即向全营下达命令：

“敌人不到50米内，不准开枪！同志们，注意隐蔽，将各人手中的武器弹药准备好，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打下去！”

黑压压的一群敌人蜂涌过来，100米、80米、50米……

“打！”陈营长一声令下，顿时枪炮齐鸣，机枪、步枪、手榴弹，所有武器都向敌群开了火。前面的敌人倒下了一大片，后面的敌人缩回去了。

大约平静了两个小时，敌人的炮火又向我阵地轰来，他们再次发起进攻了。只听见陈营长对大家说：

“同志们！要沉着，注意节省子弹，别放空枪！”当时子弹已不多了，营长这样提醒大家，非常及时。

这次上来的敌人约有两个营，他们弯着腰，放着枪，东张西望，慢腾腾地向我逼近。这次我们仍然是把敌人放进50米左右，然后用各种武器把他们打了回去。阵地前面，到处都有敌人的尸体。当然，我们也有伤亡，打退敌人这次冲锋后，同志们便立即抓紧时间，修复工事，擦拭武器。

下午1时左右，团长和政委来到二营阵地上，他们指着敌人的尸体说：

“同志们，这两天你们打得好！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敌人尸横遍野。你们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迟缓了敌人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增援计划，可以说，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十的任务。但是你们别以为今天敌人就不会再来了。”首长看了看手表，接着说：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敌人还会来的，而且来的更多，火力会更强。同志们要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作好一切准备，坚决把敌人阻击在曹

县以南！争取最后的胜利！”

团首长的讲话，振奋了军心，对我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同志们当时就表态说：

“请团首长放心，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不管敌人来多少，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只要人在，阵地就在！”

广大指战员摩拳擦掌，准备迎击敌人的再次进攻。团首长离开连队后，部队根据伤亡减员的情况，又重新调整了一下组织部署。炊事员、司号员、卫生员都拿起武器，编入班组参加战斗。

下午3时许，敌人的炮果然又响了。

狡猾的敌人这次采取了梯队轮番战术向我冲来，前面一轮敌人被打倒，后面一轮敌人在敌军官的督促下，又踏着同伙的尸体，嚎叫着涌上来。战斗十分激烈，我方的伤亡也在增大。

2排被敌人2挺重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

“叭！叭！”5班的张友信同志，在关键时刻，灵活地找了个好位置，把敌人的两个重机枪手送上西天。可是敌人仍然嚎叫着冲进了结合部。情况十分紧急！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把敌人打回去！”2营的袁副教导员在号召和指挥部队反击。他刚喊完，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

“杀！——”1排2班长王幸福端起刺刀，第一个冲进敌群，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还在不断地在上。正在这紧急关头，申团长亲自带领团预备队赶来增援。

“的的哒哒，的的的……”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我军群起反击，先是一排手榴弹投向敌群，随即一阵猛冲，直杀得敌人喊爹叫娘，招架不住，不得不丢下武器，抱头鼠窜。同志们越战越勇，一下就把敌人打退二、三华里，杀伤敌人数百，并且缴获了大批武器，赢得了曹县护城堤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阻击战结束后，很快就传来了大杨湖全歼敌整编3师和活捉师长赵锡山的捷报。同时也传来了刘、邓首长对14团在曹县三天阻击的通报嘉奖令。

“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

戎马阵中伯乐来，千方百计举人才。
善播革命好传统，桃李成林自早栽。

这是一首赞颂贺龙将军尊知爱才，重视培养人才的小诗。

1945年9月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贺龙司令员的率领下，一举攻克晋中的文水县城。第二天，贺龙司令员在听取工作汇报时，了解到当地文水中学的部分青年学生，十分渴望参加革命。贺龙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啊！好啊！这可是宝贝疙瘩！这可是宝贝疙瘩！我们的革命老区经济文化落后，斗大的字识一箩筐的人还不多，更不用说中学生了。知识分子，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需要，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接着，贺龙在分析当前敌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一项令在座各位十分钦佩的决定：“山西阎锡山与日本人勾结一起，企图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正分兵大举进犯晋中，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文水县城可能不得不暂时放弃，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进步学生留给敌人。今天下午我就去学校动员，争取把这

里的师生拉出去，转移到后方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而且还可以多招一些学生。”就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当场为即将诞生的学校起了校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并自任校长，指定自己的秘书彭德任副校长，同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学校的筹建工作。

9月2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后改为“贺龙中学”）正式成立。

为了解决学校因学生增加而出现的师资短缺、干部不够的问题，贺龙从百忙战事中抽出时间，亲自过问，并在当时部队和地方干部也很紧张的情况下，为学校选派了一批有教学经验、胜任教学任务的干部、教师到学校工作，大大充实了学校的干部和师资队伍。钟师统、李长路、彭德、李素、刘康、王建国等人就是那时从事过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

在以后的岁月里，贺龙始终没有忘记关心学校的工作，曾多次到学校视察，作指示、报告。为了把青年学生培养成具有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贺龙每次作报告，总是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求学生树立跟共产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1948年春天，贺龙从陕北参加中央会议后返回晋绥，了解到学校在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由于受一度出现的“左”的思想影响，错误地将一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清洗出学校，马上找到学校有关领导，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左”的错误做法，并责成学校很快将那批被清洗的学生请回了学校。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为了革命发展的需要，1948年8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贺龙中学）与陕甘宁晋绥步兵学校合并，在晋南临汾成立了“西北军政大学”（附设贺龙中学）。

“贺龙中学”成立三年，先后向人民解放军、地方政权和中央机关，输送了1500多名知识青年，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就是贺龙？

1945年秋，绥西河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绥东解放区。为了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贺龙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晋绥野战军挥师北上。

九月底，威武雄壮的反攻大军路过山西五寨县的西里村。这个静谧的小山村立时沸腾了。村边的大路上，人们提着茶水，捧着鸡蛋，端着一碗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莜麦面条，慰问百战百胜的子弟兵。人们更盼望能见到统率这支钢铁队伍打败东洋鬼子的贺龙。可是，在这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之中，哪个是贺龙呢？大家谁也看不出，分不清。

这天傍晚，云霞满天，村头上，大贵正帮着过路的部队铡草。他一边干活一边瞧着路上的行军队伍。心想：要是今天我能碰上贺司令，嘿！那该有多美气。由于精神不集中，一不留神，手被铡刀划破了。大贵“哎哟”一声，殷红的鲜血顺手流了下来。

正在这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个目光炯炯，嘴上留着一丛胡子的解放军策马来到了大贵面前。他翻身下马，操着亲切的南方口音和大贵打着招呼：

“喂，小伙子，怎么啦？”

“没什么，”大贵一边打量着来人，一边回答说：“给自家的队伍铡草，

伤着手啦。”

“哟！那我找个医生给你包扎一下。”

“不要紧，不用啦。”大贵赶忙劝阻道。

“要得，要得。”来人说罢就吩咐人去叫军医。接着，他关切地察看着大贵的伤势，还仔细地询问了大贵家的人口，地里的年景。然后，嘱咐随行的几个人说：“这里的群众生活很苦，支援前线的负担也很重，今后，凡是部队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不准随便动员军勤找民工了，要下个命令给部队。”

大贵一听赶忙解释：“同志，我这可不是别人动员的，是咱自家自愿的。”

正说话间，一个背着药箱的小卫生员气喘吁吁地赶来了。给大贵上药包扎。大贵心中暗想：看样子，这个留胡子的同志是个大首长，他知道不知道贺龙呢？于是，就嚅嚅着问道：

“同志，俺想打听个人。”

“谁呀，小伙子，你说吧。”

“你……你认识贺龙吗？”

“嗯——贺龙啊，”来人用神秘的目光看了看周围的人说：“怎么说呢，认识，认识，还熟得很呢。小伙子，你找他么子事嘛？”

“没啥事，咱就是想看看他，”大贵神采飞扬地说：“听老人们念叨，七年前，贺司令到过咱村一次，那是他带着队伍到河北地界打鬼子。嘿！说起贺司令，可真是有名气，听说小日本一听到他来了，就都吓得打摆子。”

“哈哈……”听到这里，来人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

“哎——你别笑啊，这是真的。大伙还说——”

“还说什么？”

“说他是天上青龙下凡，会呼风唤雨，他到哪里，哪里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好收成呢！”

这时，来人笑得黑胡子一撇一撇的，说：“没事，没事，贺龙也是人，不是神嘛，没得么子特殊的。他和你一样，是一个有着一个脑壳两支胳膊两条腿的人。”然后，他拍着大贵的肩膀说：“小伙子，请你告诉乡亲们，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就没有贺龙，离开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持，贺龙就没得一点本领哟。好吧，小伙子，好好养伤，再见！”说完，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大贵看见小卫生员有些异样，便问：“你笑什么？”

“笑你有意思！”

“什么意思？”大贵忙看已经包扎好的伤口。

“不在那儿。贺龙——我们的贺司令已经走了！”小卫生员向前一指。

“什么，他就是贺龙？！”大贵激动地大睁着双眼，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大悟似的一跃而起，一路欢叫着向村里跑去：

“喂——贺龙来了！我见到贺龙了，快去看贺龙啊！”

霎时间，全村都轰动了，娃娃、女子、婆姨，还有那小脚的婆婆，拄着拐棍的老汉，大家扶老携幼地挤出门来，汇成一条看贺龙的人流，拥到了村头的大道上。可是哪还来得及，贺龙司令员早已随着行军队伍，走得很远很远了

打败老蒋再结婚

晋绥军区司令部的驻地蔡家崖，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吃早饭的时候，扎着绑腿、腰束武装带的贺龙刚从操场回来，老远就听到哨兵和一个老汉在大门口嚷嚷：

“小同志，你就让我进去吧。”

“老大爷，不是给您说了吗，司令员不在家，有啥事您老就讲吧，我给您转达。”

“那不成，这事啊，非得咱当面念叨给贺司令才行。”说着，老汉背起褡裢径直往院子里走去。

“哎——老大爷，不行！”哨兵正要上前拉住老汉，忽然发现了正从远处走来的贺龙，赶忙喊道：“首长，您看这——”

“小鬼，不要这样嘛！”

说着，贺龙三步并做两步地赶过来，一把拉住老汉的手说：“大爷，我就是贺龙！”

贺龙把老汉让进了院子，请到了屋里，他先让老汉坐下，又端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支香烟，自己也燃着了那个木制的大烟斗，笑眯眯地说：“大爷，找我有么子事要办，您老就讲吧。”

“嘿嘿，”老汉憨厚地笑着：“说起来，也没甚大事体。咱家是武家峁同善村的，姓高，草字占维，人家都叫我高老汉。”

“噢——高大爷，今年的收成还好吧？”

听到贺龙问起收成，这老汉更是喜笑颜开，呷了一口茶就打开了话匣子，讲到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贺司令又领着队伍保着边区，今年又是好年景，打下的粮食吃不完，家里又挖了一眼窖，揽了几只羊，还和老伴合计着想给娃把婆姨娶进来。说着说着，高老汉就像吃了蜜糖罐一般，又“嘿嘿”地笑了，贺龙听着听着，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两个人的朗朗笑声从门缝里、窗棂里钻了出去，传得好远好远。贺龙边笑边说：“大爷，给娃娶婆姨，这可是大喜事，我给您老贺喜了！”

“是啊，是啊，可就是——”不知为什么，突然间，高老汉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

“大爷，可就是怎么了？”贺龙诧异地问道。

“嘿嘿，就是俺那娃眼下在咱队伍上，不知领导上能不能——”

“噢，我明白了，”贺龙打断老汉的话，“您老是想给他请假回家结婚，我猜得对不对？”

“对！对着哩，贺司令，您看这事——”高老汉面有难色地搓着双手，两只眼睛期待地望着贺龙。

贺龙踱着步子，思忖了一会儿，说：“大爷，这事好办，我批准了！”

“贺司令，您准了？没想到您一个大司令还管这点小事，俺和老伴可真要好好谢谢您啦。”说到这里，高老汉激动地站了起来，热泪盈眶地拉住了贺龙的两只手。

“老人家，这是哪里话。”贺龙忙把老汉又扶到椅子上坐下，说：“干部要关心战士，要像父母对儿女，哥哥对弟妹那样爱护战士，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传统，是每个干部都应该做的，我这个司令员做得还很不够哩。别忘了，到时我还要到您老家里讨杯酒吃哩。”

“那当然，那当然。”高老汉又开心地笑了。直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一条

线，幸福的泪水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贺龙向高老汉问清他儿子高来元所在部队的番号，又安排他去吃饭，然后提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高来元，让他跟父亲回家完婚。另一封给高来元所在部队的首长，让他们在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准小高的假。

贺龙爱民如父，爱兵如子的这件事，使高来元及他的部队首长深受教育。高来元更是激动万分，他决心更努力工作，奋勇杀敌，来报答贺司令员对自己的关怀。没过多久，贺龙就收到了他的这样一封回信：

亲爱的贺司令员：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内容明白。

我家里今年收成不错，生活也比往年好。关于我父亲叫我回去结婚的事，因我还年轻，现在工作又忙，我想往后推推，我已经说服了父母，等把蒋介石彻底打败了，再办理自己的婚姻大事，好好享享太平日子，我一定好好工作，以报答您对我家和我的关怀。

祝你健康

敬礼

战士 高来元

消息灵通的《晋绥日报》记者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就写成了一篇通讯登在报纸上，标题是：“战士高来元给贺司令员来信坚持工作不忘革命好处”于是，贺龙写信关心战士高来元婚事的故事，很快就在晋绥解放区传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部队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众口皆碑的一段佳话。

杨得志邯郸破敌

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和平协定。“双十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国民党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在协定墨迹未干之时，就以14个军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突贯进击，其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我华北解放区之势。

一时间，华北平原上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土路上，人嘶马叫，尘土飞扬；铁路上，气笛长鸣，一列列军车满载着国民党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向我华北解放区杀奔而来。企图控制铁路，发挥美国现代化装备的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退入农村或山地，以便于各个歼灭。

这3路进犯军，以平汉路的为主。其首要的目标，是夺取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

向平汉路进犯的敌人都是原西北军的底子，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久经训练，在国民党军队中算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在装备上火力重于突击，其30军是半机械化部队。他们善于阵地战，特别长于工事构筑和固守，但缺乏机动和反攻击精神，尤其不善于运动战。在野战中，惯于以正面部队巩固阵地、钳制对方，以有力部队施行一翼或两翼包围，或以优势火力给对方以有力的杀伤。装备虽较先进但比较笨重，行动迟缓，互相间的协同和支援也较差，对后方顾虑多，怕我军抄他的后路。由于官兵打

仗目的不明确，所以多怕死、不善于白刃格斗，最怕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打遭遇战和夜间战斗。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在山西指挥上党战役后，尚未返回邯郸。邯郸前线只有杨得志、苏振华所部不到2万人组成的第十纵队。敌我兵力是五比一。

刘伯承用征询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根据敌我态势和地形条件，我们可以把战场选择在平汉线东侧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里。这里是多沙地带，不好挖工事，无坚可守，北有滏阳河可挡住敌人进路，南有漳河可阻断其退路，可以把敌人的长处转化为短处，使我军能够避其长击其短。我军东西有纵深的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的支援，可以叫杨得志他们利用滏阳河、漳河间的横幅地带向敌人实施钳形攻击。

一向沉稳的邓政委听后，不禁一拍大腿，高声说：“好，咱们想到一块去了，就叫杨得志他们这样干。”

很快，杨苏首长收到了刘、邓首长签发的《关于平汉路作战部署给一、二纵队首长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1纵要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顶着北犯之敌。

10月14日，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指挥第一梯队从新乡出发，沿铁路及其东侧向石家庄方向大摇大摆前进，气势汹汹的杀奔而来。由于前进中未遇我主力，速度较快。10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北渡漳河，占领邺镇、丰乐镇等处，掩护架桥。

站在漳河岸边，马法五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笑了。

严峻的现实提醒杨得志、苏振华，1纵要完成刘、邓首长赋予的光荣任务，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一个困难，是部队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杨得志由延安重返冀鲁豫后，中央曾指示冀鲁豫部队精兵轻装，准备进军东北。根据这一指示，冀鲁豫部队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动员和教育。由于考虑到开赴东北后可以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因此，把原有的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轻武器移交给了兄弟部队，有的建制连只留了4挺轻机枪和三分之二的步枪。而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却接到了参加平汉战役的命令。从准备远征东北到留下就地参战，思想的弯子可以转，但移交兄弟部队的武器却不可能索回了。

再一个困难，是面临重兵强敌的攻击。

敌3个军中，鲁崇义的30军是半机械化装备；马法五的40军可以打近战，还能拼手榴弹，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高树勋的新八军战斗力也不弱。

时值10月，田野里可利用的隐蔽物极少，漳河两岸又是一马平川，多系沙土地质，构筑工事极难。没有相应的工事，要想在大平原上狙击这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便意味着要准备作出巨大的牺牲。

在这种态势下要迟滞敌人的进攻，等待兄弟部队赶到聚而歼之，恶战苦战是少不了的。纵队党委决定，把所有的困难向部队讲清楚，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研究落实刘、邓首长关于1纵指挥要果断，行动要灵活，狙击要坚决的指示，千方百计地迟滞敌人的行动。

敌人主力北渡漳河后，很快占据了距邯郸只百余华里的磁县，与他们原先盘踞的临漳、成安、肥乡等地形成对邯郸的扇面形包围圈，并齐头向邯郸逼进。形势既紧张又严重。

1纵的作战会议，正在1纵驻地、邯郸南边的小堤村进行着。杨得志首

先讲话：

“邯郸是一座古城，春秋战国时为赵国的国都。那时的赵国，东临燕、齐，西接秦国，南连韩、魏，北迫匈奴，‘数拒四方之敌’，被称为‘四战之国’。到了近代人们又称它为‘四战之地’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敌对双方都志在必得。”

“我们1纵此时也处在‘四战之地’的重要战略位置上，因为从我们这个地区看，北可同晋察冀部队共同抗敌，南可与中原部队相接，东可协同华东部队作战，西可配合陕甘部队对敌，既处于‘四战之地’，又要担负起“四战之军”的重大使命。”

这时，苏振华政委接上来说：

“邯郸北面不远处有个唤黄梁梦的小村。据说，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传奇中，山东卢生大作“黄梁一梦”就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这个典故吗？”
旅团长们大多是工农出身，大多数摇头，表示没有听说过。

苏振华接着说：

“这个典故讲的是卢生在邯郸旅店中遇到了一位道士，他给卢生一个枕头，卢生枕在上面睡着。这时，店主人刚蒸上一锅黄米饭，卢生梦见自己做了大官，娶妻生子，享尽了荣华富贵，一觉醒来，黄米饭还没有做熟。”

讲到这里，苏振华提高了声调说：

“蒋介石也在做着黄梁梦，正梦想在邯郸取胜，维持其反动统治，我们要打破他的美梦”。

苏振华讲完，杨得志具体布置战斗：

面对强敌，全面阻击的办法显然不行，节节阻击，我伤亡必大，且会助长敌人气焰，所以，纵队决定首先以小部分部队出其不意地奔袭敌人先头部队，能歼则歼，不能歼则消耗和杀伤敌人一部分，然后即撤出战斗，另寻战机。虽然奔袭过去，有时扑空，有时因敌人过于集中难以在短小时内取胜，有时打上了要撤出来却相当困难，部队的体力会消耗很大，但可以取得减缓敌人前进速度的效果，为大部队赶至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小堤等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争取了时间。”

敌人依仗人员和武器的优势，不惜一切代价地往北推进。鲁崇义的30军越过高树勋的新8军和马法五的40军，进占了滏阳河东侧距邯郸只有30多里路的马头、高母营以南地区，其先头主力部队向我崔曲、小堤一线急进。

崔曲距邯郸只十几里地，小堤一带是我1纵及所属3个旅的指挥所的所在地。这一带村庄比较稠密，群众为了防沙，在村与村之间的沙窝地里，种植了不少杨树、枣树和梨、桃、杏树，构成了自然的屏障，为我军阻击敌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1纵的几位负责人都清楚，这里可以说是我军保卫邯郸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万一被敌人突破，就等于敞开了邯郸的大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纵队决定把1旅放在崔曲一线。1旅决定拿他们的主力7团放在有二三百户人家的崔曲村。杨得志向1旅旅长杨俊生、政治委员邓存伦交代完任务后，说：

“崔曲到邯郸的距离你们是清楚的。部队边打边转移，体力消耗大，减员不少，但是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边。实话对你们说，我们并不是一点也不担心呀！”

杨、邓二位当然明白杨得志的意思，他们对视了一下，没有讲话。过了

一会，杨俊生才说：“2旅和3旅的担子也不轻，至于我们1旅，”他停下来看了看邓存伦，接着说：“司令员是了解的，信任的。”

说罢，2人严肃地向杨得志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杨得志站在门口，但见两位他十分心爱的战将，跨上战马，猛抽几鞭，战马长嘶一声，很快就消失在沙土飞扬的小道上……

敌人很狡猾。他们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后，让原来突出在前面的30军留在原地，40军和新8军一部则继续往北推进。以40军106师为主，直扑我军1旅7团防守的崔曲，并发起连续的攻击。这时7团的工事并没有完全筑好。敌106师师长李振清，外号叫李铁头，经常赤膊上阵，是一个亡命之徒。

上午10时，敌106师猛攻7团阵地不能得逞，敌师长李铁头气得哇哇直叫，只见他扒掉上衣，光着膀子，紧了紧腰带，从卫士手中夺过冲锋枪，“哒哒”朝天射上一梭子，大喊一声“跟我来！”带着全师人马，又向我4团扼守的夹堤、6团扼守的小堤阵地冲来。

1旅指挥员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地，终不能得逞。战至下午2时，敌人仅占领了6团阵地侧翼小堤西北角一个地堡和南大屯东南角土窑。

25日上午，敌集团由南北文庄向6团小堤阵地猛烈攻击未得逞，下午2时又向7团赵庄阵地猛攻。敌集团分别向我7、6团阵地轮番攻击失败后，即采取偷袭手段，于25日下午6时，利用黄昏时的暮色作掩护，以新8军一部兵力迂回攻击屯庄，同时以106师两个团集中向我第4、7团阵地接合部夹堤、崔曲之间发起猛攻。

此时，天色昏暗，刮起大风，风沙障眼，与敌战至晚9时，敌约一个团从夹堤、崔曲间3华里正面的野地突开一个口子，对扼守屯庄的7团2营进行了迂回包围。接着，敌后续部队蜂拥而至，一部敌兵迂回到夹堤西北侧背。

我4团根据当面敌情，即以1营1连出击，因西北侧未作工事，出击中1连伤亡过大，撤下来时，敌乘机猛攻，1营力不能支，遂撤至夹堤东半部与敌坚决对峙，夹堤阵地西端即被敌占领。

这样，坚守崔曲阵地的7团3营便处于东、西、南三面受敌的境地。

情况紧急，1旅旅长杨俊生立即拿起电话，大声命令7团团李程、3营教导员周涤民带领7连和9连于傍晚从崔曲北面绕到屯庄，前去接应2营。

3营抵屯庄一侧，见屯庄以及北面小村均已被敌人占领。村内到处点起火堆，敌士兵三五成群连夜伐树，抢筑工事。3营正准备转移返回崔曲报告，半路上恰遇2营教导员张喜登及6连长苏丕祯等率部队突出重围，即同返崔曲。

7团与敌竟日血战，伤亡消耗较大，又处于被敌夹击的险境，为保存战斗力，以再给敌人坚决反击，奉命撤出崔曲至夹堤东半部，继续与敌对峙。

午夜前，敌106师占领崔曲，其前出部队进至沙口、南泊村。敌先头部队北距邯郸已仅12华里了。

在崔曲的一所平顶房子上，敌师长李振清手持望远镜，正在观察战场形势，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用脚踩着房顶，望着身旁的参谋长，得意忘形地说：

“我的脚下，就是共军的阵地，他们常自称是铜墙铁壁，我李铁头也要把他撞碎。”

李振清很有些踌躇满志了。

的确，对于我1纵来说，形势是极为严重的。敌集团若突破我1旅最后

抗击线，将由邯郸至高邑间 300 华里的无设防区长驱直入，与南援之敌第 16 军会合，我军整个战役计划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落空。

在纵队指挥所里，杨得志已有两个小时没有接到 1 旅指挥所的战况通报。

“是不是找一下杨俊生他们？”苏振华问杨得志。

杨得志摇了摇头，说：

“有情况他们会报告的。现在可以肯定，7 团的伤亡一定很大了。是不是考虑把 3 旅拿上去？”

正在这时，参谋进来报告说，1 旅报告，他们和 7 团的电话中断了，现在正派人去联系。杨得志虽然预感到崔曲很可能已经被敌人突破，但是话并没有说出来。只是对参谋长卢绍武说：

“通知各旅旅长和政治委员，火速到纵队来开会。”

3 个旅的干部汗淋淋地赶到纵队指挥所的时候，看到杨得志，苏振华紧绷着脸，情绪都有些紧张。他们满身的硝烟尘土，只几天没见面，人们好像突然变了样子。邓存伦进门来，抓起一只碗，一连喝了两碗水，激动地对杨得志说：

“7 团打得很苦，我见到了团的干部，副团长徐中禹哭了。战士们要求领导上信任他们，他们一定会把崔曲夺回来！”

各旅的领导简要汇报了各自的情况后，杨得志缓慢而有力地说：

“1 旅撤出了崔曲，仗打得很苦，也打得很好，同志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不能让敌人再进一步。大家还记得中央的指示吗？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要！一旦敌人突进邯郸，刘、邓首长的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 1 纵将无法交代。办法只有一个：明天拂晓前把崔曲夺回来！管他什么李铁头、李钢头，都要把他砸烂！”

杨得志提出夺取崔曲的兵力部署和打法后，苏振华政委说：

“今天的会议就是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 1 纵必须完成刘、邓首长的战略意图，现在兄弟部队正从山西往这里赶。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只许胜，不许败！”

“对！”杨得志斩钉截铁地说：“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3 个旅的旅长、政委都十分明白。夺不回崔曲，是要军法从事的。

大家跟随杨得志征战多年，都知道他轻易不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都是到十分关键的火候上，而且说了就兑现。

战至 29 日下午 3 时，敌 106 师师长李振清率残部自崔曲、赵庄、屯庄向南、北左良方向突围。我 1 旅 4、6 团、2 旅及村内 7 团、16 团跟踪追击。

突围之敌先头部队经 20 团阵地侧翼逃跑。20 团王大顺团长率 3 营，团副政委率 2 营，参谋长率 1 营全线出击，并以一部攻入崔曲，协同友邻团肃清村内之散敌。

经过激烈战斗，在友邻第 2 纵队配合下，我 1 纵 2 旅和 1 旅 4、6 团，歼灭向南突围之敌一部，仅剩敌师长李振清率少数残部侥幸逃脱，分路窜入南、北左良。

夺回崔曲，杨得志、苏振华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他们一面向刘、邓首长报告，一面要各旅迅速整顿队伍，准备再战。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各路大军陆续到达，1纵和兄弟部队一起奋勇歼敌。战役至11月2日结束，1纵和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4万余人。

“东北的故土就是我的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但是，由于战后形势发生了急骤变化，整个东北局势动荡不安。中共中央鉴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严重局势和未来斗争发展的趋势，果断定下决心，立即着手调整战略方针。为切实保证“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贯彻，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高级干部到东北，以会同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

时任晋察冀军区11分区副司令员的张学思，接到调任东北工作的指示后，火速奔赴沈阳，着手组建辽宁省政府，并出任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利用其特殊的背景和身份开展工作。

张学思见到东北局领导彭真、林枫后，彭、林二人首先向风尘仆仆赶来的张学思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征求他个人的意见。

张学思听后，显得十分激动。他起身紧紧握住彭真、林枫的手说：“一切听从党安排，党需要我干什么，我一定努力去干好！”

工作谈完了，彭、林二人考虑到张学思离开大帅府已有14年之久，就建议他回家看看。

林枫对他说：“大帅府故居保存尚好。“九·一八”事变后，曾被作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东北局进驻沈阳后，曾在那里开过一次会，然后就在那里撤了出来。现如今，既然你回到了家乡，大帅府也该物归原主了。我看，你就还住原来的家吧。”

“是的，还住原来的家吧！”彭真也说。

“不！”张学思立刻摇头谢绝：“我是不打算回家的！”

原来，张学思离开大帅府，投奔革命时，曾经发过誓，永远离开这个封建的大帅府！

张学思深情地对彭、林二人说：“党委以我重任，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如果回家看着那些旧屋旧物，难免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怀旧情感。再说了，家里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回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东北是在人民手中光复的，大帅府应归人民所有，我没有资格再做它的主人。”

“复土还乡嘛，回去看看也是应该的吧！”彭真在旁继续劝道。

“我已经回家了，东北的故土就是我的家，东北的人民就是我的亲人。”张学思笑着回答。

张学思在辽宁省担任省政府主席期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离故居虽然近在咫尺，却从未回去过一次。

计擒“白脸狼”

日本宣布投降，东北光复，白山黑水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脱出来。

叶长庚受命赴黑龙江，担任新成立的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的黑龙江地区，日伪残余和土匪活动非常猖獗。一天，叶长庚接到

庆安县土匪头子率部投降的报告，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知道，这股土匪的头子外号叫“白脸狼”，一贯思想反动，以凶狠狡猾而出名。而且从前几天截获的电报看，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郑洞国，还委任他为“警卫旅”旅长。叶长庚想，这样的反动分子绝不会真投降，肯定是诈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叶长庚决定将计就计，在庆安县城设宴欢迎他们“弃暗投明”。

约定的时间到了。被新任命为省军区警卫营长的“白脸狼”，果然如约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土匪，贼头贼脑地走进早已摆好丰盛酒宴的县政府宴会大厅。

“弟兄们，你们弃暗投明，从今以后走上一条光明正大的路，我们表示欢迎……”招呼土匪们坐定后，叶长庚首先站起来发表讲话。

接着，“白脸狼”也假惺惺地说了几句之后，宴会开始。

看着桌子上的美酒佳肴，土匪们早已垂涎欲滴，哪还有心思听讲话。一听说开宴，临行前的交待更丢到了爪哇国，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站在旁边的“招待人员”也都凑上来连连劝酒，只一会儿功夫，土匪们就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有的土匪还摆开架式，吵吵嚷嚷地划起拳来。

这时，在包间里的“白脸狼”，如坐针毡，心神不宁。看到大厅里土匪们放松警惕，真吃真喝起来，真有些急了。他气呼呼地走了出来，用马鞭指着土匪们，大声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们别他娘的让这黄汤给灌迷糊了，哪一个贪酒误了事，老子就枪毙了他！”

叶长庚担心这家伙疑心重，看出破绽来，急忙跟出包间，说道：“何必呢！今儿个高兴，让弟兄们放开肚皮喝个痛快，不会误事的。来，我们喝，喝！”说着把他拉回包间，继续劝酒。

言谈中，叶长庚从“白脸狼”的嘴里得知，他只带了三个连进城，还有两个连等在城外。看来，这家伙是想搞个里应外合了。

真是一只老狐狸！

酒喝得差不多了，该行动了。叶长庚按事前制定的计划，把手一挥，高声叫到：“快拿好酒来！”这是动手的信号。

只见两位身材魁梧的大汉提着酒瓶进来，装着上前给“白脸狼”倒酒，猛地一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往后一扭，擒住了“白脸狼”。此时，隐蔽在外的解放军战士，一拥而上，解除了早已喝得丧失战斗力的土匪武装，使之全部束手就擒，成了俘虏。

一看阴谋败露，“白脸狼”急了，他挣扎着叫嚷道：“你们说话不算数，骗人！”

“收起你那套鬼把戏吧！”叶长庚指着“白脸狼”的鼻子说：“国民党郑洞国的警卫旅长先生，我问你，既然你来投降，为什么还同长春的郑洞国用电台联络？为什么不把队伍全部带来，而要留在城外？为什么一个个荷枪实弹？你究竟安的什么心？说！”

听到叶长庚厉声质问，“白脸狼”知道与郑洞国的阴谋败露，一下子瘫倒在地，只好低头认罪。

讲“价钱”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急于“摘桃子”。他仗着美国人的撑腰，气势汹汹地扑向东北。新四军三师奉命从苏北开往东北，刚到锦州附近，就得到了敌

军攻占锦州的新闻。东北局急电黄克诚，命令他率部切断铁路交通，阻止敌人进入沈阳。

对于执行命令，黄克诚同其他许多指挥员不大一样，有时他毫不犹豫，有时却要讲讲“价钱”，而“价钱”又常常是非讲不可的。他拿着东北局发来的电文，思量再三。情况明摆着：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这是其一，东北地区尽管军用物资很多，但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与国民党政府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部队得不到及时补充，这是其二；东北地区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又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部队给养解决不了，这是其三；干部战士没有棉鞋、棉帽，棉衣也只有薄薄的一套，而东北的气温已降到零下几十度，这是其四。这些不利因素，被黄克诚归纳为“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袜。这样情况下，怎么能进行大规模作战呢？黄克诚刚到东北，同东北局的同志不太熟悉，便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实事求是地汇报了部队的情况，提议三师部队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第二天，他又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很快，毛泽东复电了，他指示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指示，提出建议。中央军委也复电了，让他同林彪直接商谈有关问题。收到军委复电的当天，黄克诚立即向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提出：“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减弱强大力量。”黄克诚建议，要利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几个月时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初步建立根据地，以利明春大规模作战。在电报的最后，他提出，如果上述意见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10个县地区给3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引起东北局的重视，黄克诚接着又发去两份重申意见的电报。

连续三封电报，载着黄克诚的忧虑和建议，飞往东北局，却未见回音。黄克诚摸不着头脑，只得做好执行东北局下达的作战命令的准备。这天，他同洪学智一起，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部署任务。看完地形回到驻地，一位老熟人正在等着他呢！

原来，李天佑来了。1936年红军东征后，李天佑任四师师长，黄克诚任四师政委，两人搭挡过一段，彼此很熟，见面后很是亲热。李天佑告诉黄克诚，他是奉林彪之命来联系的。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黄克诚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协调整个东北战局的行动了。他立即同李天佑一起策马奔向20里外的林彪住地，当面向林彪提出了关于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他说：“部队现在状况，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而且没有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轮船进东北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

林彪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命令3师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东北是中国重工业的集中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晨，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作战。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歼灭日本关东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1日命令，晋绥、晋察冀、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和晋察冀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部队即分别向辽宁、吉林等地进发，收复失地，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贯彻其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既定方针，一面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面迅速调动大量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地区，以“受降”名义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实行分割包围，以便伺机发动内战。面对这种严重局势，为对付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进军东北建立根据地的部署。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不但南可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摆脱长期以来解放区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包围的境况，而且还可作为支援革命战争的稳固可靠的后方基地。如果东北落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手，则解放区势必处于受到南北夹击的不利地位。9月15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正式作出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于当天到达沈阳，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后，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张闻天等十几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陆续到达，加强党对东北地区工作的领导。19日，又向全党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立即从各战略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会同长期在该地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消灭日伪残余和土匪，建立各级民主政府。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进入东北的部队和抗日联军教导旅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至11月底，先后进入东北地区的部队共11万余人，党政军干部2万人。这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迅速由海上、陆地和空中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以武力独占东北。在这种形势下，为求打开东北局面，中共中央于11月下旬指示中共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从中长铁路沿线及各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12月2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规定：我们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及其附近，而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并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工作的重心是群众工作，要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为此，要反复教育干部和部队，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要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共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一面加紧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抽调部分野战部队组成10个军区和15个军分区，进行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打击日伪军残余，清剿土匪，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的

斗争。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3月，将所属10个军区改编为北满、辽东（南满）、吉林（东满）、西满4个军区，下辖12个小军区，全军共30余万人，加强了对根据地斗争的领导。这时，苏军自沈阳地区北撤，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及辽宁大部地区，并继续北犯。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东北民主联军于4、5月间进行四平保卫战，予敌以重大杀伤后，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军占领长春等地。这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凭借其军事优势，抢占了占全东北总人口53%、面积30%的地区，使我党在东北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

6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局关于内部分工的报告，为统一领导东北工作，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局长、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7月初，林彪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前一时期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东北的具体情况，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立即坚决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45年12月28日指示，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和逐步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依据这一方针，会议于7月7日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对指导东北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强调要把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为第一位的工作，要求军队应以主力兵团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土地改革，肃清匪伪，巩固根据地；号召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到农村去，全面展开根据地建设。从此，掀起了建设根据地的高潮。25日，东北局发出《关于抽调兵力进行群众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除抽调1/3或2/3的兵力外，再抽调2至3个团的兵力清剿土匪、发动群众、掩护工作团开展工作。指示下达后，东北民主联军即以一部主力抗击国民党军的正面进攻，以一部主力投入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在大批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广大城乡积极加强基层人民政权建设。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此后，经过1年的政权建设，东北行政委员会下属的各级人民政权基本建立。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到1946年12月底，共开辟根据地面积62.6万余平方公里，占东北总面积（含热河省）的70%；根据地人口1800余万，占东北总人口的46%，东北根据地已渐趋巩固。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逐步深入，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掀起了参军参战高潮。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到46万余人，歼灭日伪军残余和伪警及地主武装9万余人，匪患基本肃清。

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夺取东北战场1947年战略反攻和1948年战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为解放战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

建立第一支坦克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各战略区，要尽可能把日军丢弃的车辆和器材搜集起来，着手建立特种兵部队。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首先行动起来，于1945年8月把搜集坦克和器材的任务，交给了在总部工作的高克、霍舒亭等人。一天，上级领导对他们说，在东北边境地区和铁路沿线各战略要点，日寇遗弃了大批火炮和坦克，要尽快把这些武器搜集起来，建立人民的坦克部队。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有飞机、大炮、装甲车，他们仗着这些武器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使中国抗战军民吃了不少亏，流了很多血。现在听说上级要他们搜集坦克，建立坦克部队，高克等人十分高兴，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为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作贡献。

随后，高克、霍舒亭带领人员分头行动，展开搜集工作。

当时，东北形势异常混乱，地方反动势力非常嚣张，搜集工作十分艰巨。

11月中旬，高克在侦察时发现，沈阳原日军坦克装配修理厂有坦克，他当即带领几个战士进厂，冲破敌伪人员的盘查和封锁，在老工人帮助下，将2辆日式坦克开了出来。

不久，东北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援下，从海陆空大举向东北运兵。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主动撤离沈阳，同时命令坦克向通化地区转移。当坦克开到沈阳东北小桥子屯时发生故障，只得就地修理，其中一辆由于被敌伪人员破坏严重，已无法修复。

这时，奉命由延安开赴东北的延安炮校，已到沈阳。炮校领导听说后，立即派干部刘大祥带1个警卫排前来接应，将刚修复的那辆坦克开到沈阳郊区炮兵学校驻地马家湾子。

12月1日，炮兵学校以刚修复的那辆坦克为基础，正式成立全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开始称炮兵学校坦克大队）。全队约30人，1辆坦克。孙三任大队长，毛鹏云任政治委员，高克、霍舒亭、刘大祥任副大队长。

在成立大会上，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宣布大队领导任职命令后，接着讲话。他说，这1辆坦克是开头，是基础，是建设人民坦克部队的开始。他接着说，我们要以学校当部队，以部队办学校，培养出成批的政治立场坚定而又懂得技术的干部，争取尽早参战，在战斗中成长和壮大。

朱瑞的讲话，给大家以很大鼓舞，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学习技术的信心。

与高克同时出发搜集坦克的霍舒亭等人，11月15日来到四平东哈福山区。这一带曾驻扎过日军坦克部队，溃散时遗留有坦克和器材。

一天，霍舒亭几人突然发现6辆坦克横七竖八地陷在泥里，附近还有1个坦克器材仓库，零散和整箱的器材堆满一屋。顿时，大家眼睛一亮，非常高兴。

霍舒亭和技术人员立即进行检查，发现除电瓶、电台和机枪被卸掉外，坦克其它机件完好。他们马上动手挖坦克、搬运器材。当地政府还动员几十个民工帮助挖掘。

指战员和民工们冒着摄氏零下20度的严寒，奋战两昼夜，终于挖出4辆坦克。经过简单修理，4辆坦克都响起“轰！轰！”的鸣叫声。

“发动着了！”“坦克发动着了！”在场的人们雀跃起来。

接着，他们用这4辆坦克去拖深陷的另外两辆坦克，终因冻得太实，拖拉无效。

这时，形势发生变化，上级命令他们立即转移。霍舒亭等人奉命带着4辆坦克、1辆汽车和7车厢器材、油料，前往通化与坦克大队会合。

为搜集坦克、器材，补充和改善装备，在东起虎林，西至满洲里，南自大连，北到暖瑋的漫长铁路沿线和广大农村、林区、山地，都留下了坦克大队搜集人员的足迹。

孙三、毛鹏云、刘大祥等人也先后在抚顺、铁岭和西满军区、牡丹江军区等地，收集到坦克 15 辆、汽车 2 辆和 300 桶柴油、汽油、机油。这些坦克、器材、油料，为东北坦克大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东北坦克大队成立后，便投入紧张的战备整训。在情况多变、人员分散、教材、教员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常常是在转移途中，在边收集器材、边装修车辆的过程中进行应用训练。数九寒天，冰天雪地，在摄氏零下 30 度的风雪条件下，进行驾驶、射击和修理训练，既学习了技术也锻炼了思想。

1946 年 5 月，东北坦克大队奉命进驻黑龙江省宁安县，配合兄弟部队剿匪。7 月中旬，又移驻东安县（今密山县），并改称战车大队，下辖 3 个坦克队。全队 400 余人，拥有各式坦克 20 辆、牵引车 10 辆、装甲车和汽车 30 辆。

1947 年 10 月，战车大队扩建为战车团，拥有各式坦克 32 辆，装甲车和各种汽车 53 辆，为学习技术和参加战斗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1949 年 2 月，人民解放军第 1 个战车师——第 4 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师在天津成立。全师 5500 余人，拥有战车 120 辆、装甲车 143 辆。5 月，中央军委正式命名该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 1 师。

在此期间，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坦克，晋冀鲁豫野战军坦克队在 1946 年 9 月、华东野战军坦克队在 1947 年 3 月、晋察冀军区坦克区队在 1948 年 2 月先后组建。1949 年 3 月，华东野战军坦克大队扩建为战车团，11 月又扩编为战车师，并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战车第 2 师。全师 3135 人，拥有各式坦克 179 辆、装甲车 95 辆。

至 1949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已编有 2 个战车师和 2 个战车团，拥有兵员 9700 余人，日、美式各式坦克 410 余辆，装甲车 367 辆，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新生的突击力量。

国共双方签订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截止 1945 年 9 月中旬，共调动 36 个军、73 个师。10 至 11 月，又以美国军舰、飞机将 4 个军分别运到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以接应沿铁路线推进的国民党军主力，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道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党在谈判中屈服。

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严重的军事形势，各解放区部队在继续肃清拒绝投降的日伪军的同时，依据中共中央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和“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的原则，以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对进犯的国民党军予以坚决自卫还击，先后进行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在进行上述各主要战役的同时，各战略区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争取我军的有利态势，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这些作战行动，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回击。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无和平诚意，坚持内战反共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忧虑和愤慨。在国民党统治区，以昆明“一二一”惨案为起点，掀起了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同时，美国政府露骨的扶蒋反共政策，

导致国共冲突的日益加剧，并因而引起美国国内舆论的谴责和美国统治集团中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被迫决定部分地修改它的对华政策，遂委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内战”。

12月27日，就停战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张群等提出《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大批军队还没有全部运到内战前线，先头部队向解放区的进攻连遭失败，加之政治上日趋孤立，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于12月31日迅速同意重开谈判。接着，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经几度商谈，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随后，在马歇尔的参加下，国共双方经过继续谈判，于1月10日签署这一协议，并颁发《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同日，国共双方分别向所属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并规定停战命令于1月13日午夜（12时）生效，届时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接着，由国共双方代表和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政府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令的实施。

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协议的签订，是中共中央在抗战胜利后坚持正确方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针锋相对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民主要求，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但是，蒋介石对停战毫无诚意，在停战令下达的同时，即密令其国民党军迅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蚕食、进攻，并加紧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准备。从停战令发布到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时止，国民党军共向解放区进攻4300多次，占领城市和乡镇2500余处（座），前后使用的兵力总数达270万余人次。

中国共产党对美蒋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分别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工作；还派出代表和工作人员参加由军调部决定组成的36个“调处小组”分赴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执行调处任务。同时，解放区军民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予违反协议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打击，并进行了以练兵、减租和生产为中心的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为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作了必要的准备。

耿飏智挫特务

1946年1月11日，古都北平，寒风呼啸，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到处呈现一派肃杀萧条的气氛。

这时，一辆美式吉普车由西向东开来，直奔北京饭店。“吱……”，吉普车稳稳地停在饭店门口。车门打开，一位身穿八路军军服的高个儿军人从车内出来，他抬头看了看饭店高大的建筑，然后从容不迫地迈上台阶。他气宇轩昂的派头，坚实有力的步伐，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身上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新气息，仿佛给周围灰灰的，冷冷的街头增添了几分生气。

他就是奉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之命，刚刚乘飞机赶到北平，来参加军调部工作的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飏。

军调部，全称为“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根据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在北平设立的机构，其任务是执行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调处军事

冲突等。军调部由重庆军事三人会议直接领导，即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的“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因此也称“三人小组”。军调部的组织是设委员三人，也是军调部内最高领导：国民党政府方面委员为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国共产党方面委员为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方面委员为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军调部工作人员住在北京饭店，办公、开会则在协和医院。

一跨进北京饭店的门槛，耿飏就感觉到有种压抑的气氛，宽敞的大厅里，有几个鬼头鬼脑，溜来窜去，形态各异的人。他们一见有生人进来，马上从四周投去阴险的目光。

“这是些什么人呢？”耿飏心想：“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特务。”

正如耿飏判断的一样，当时，北平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便于监控中共代表团，费尽心机地搞了许多阴谋诡计，住房安排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安排中共代表团人员住在饭店一层和二层的部分房间，国民党代表团住二层一部分和三层一部分，美方人员则住二层。国民党特务密布在饭店门口、大厅和一层、二层的角落里。中共代表团人员进出饭店或在各个房间走动，都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

耿飏不由地警觉起来。

1月12日，军调部召开三方参谋长协调会议，耿飏以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的身份将出席今天的会议。

清晨起来，耿飏坐上军调部的吉普车直奔协和医院。路上，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和耿飏攀谈起来。耿飏心里想着参加会议的事情，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谁知说着说着，话题就扯到中共代表团上来，顿时引起了耿飏的警惕，他心想：莫非他也是特务？

从协和医院返回驻地北京饭店后，耿飏立即将自己发现的情况向秘书长李克农作了汇报。听耿飏一讲，李克农立刻点头表示同意他的判断，说：“是的，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当局是安插了一些特务充当司机。”随后，李克农提醒耿飏以后出门多加小心。

抗战期间，耿飏在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时，兼过联络部长和司令部情报处长，曾向北平、天津等地派遣过四、五十人做地下工作，搜集日军的情报。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失去了联系，他一直挂在心上。所以，他决定利用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机会，抽空去找寻失去联系的同志。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叶剑英的支持。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耿飏走出北京饭店的大门，身后就会出现一二条“尾巴”。于是，他就在大街小巷、胡同公园里来回兜圈子，弯弯绕，与国民党特务“捉迷藏”。有时，明明要去西城，他却偏偏到东城的胡同里乱转，直到确信用掉了“尾巴”，才向西城奔去。有的时候，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返回饭店，看到刚才被自己声东击西之计搞得晕头转向，瞪着一双迷惘困惑的眼睛瞪着自己时，不禁心中暗暗高兴。

不久，耿飏接受一项任务，要他到宽街附近去接著名法学家陈瑾昆先生13岁的小女儿来北京饭店，准备送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然后送到延安。

临行前，李克农郑重地叮嘱耿飏：“国民党方面目前还不知道陈瑾昆已在延安，所以这次行动你千万要小心，不要暴露陈家，以免遭迫害。”

为了确保这一行动万无一失，耿飏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他换上便

服，外套一件里外不同颜色、但都可以作面子的大衣，头戴一顶灰色礼帽，怀揣一顶黑色便帽，便快步走出饭店。

出门后，耿飏没走多远，就感觉身后有“尾巴。”于是，他停下来，装着看路边商店陈列的货物，用眼角余光一扫，果然发现一条“尾巴”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站着，往这边张望。

耿飏嘴角露出轻蔑地笑容。他决定采取“弯弯绕”的老办法甩掉这根讨厌的“尾巴”。可是，尽管他在王府井的大小胡同里兜来转去，就是没法将这根“尾巴”甩掉。这个特务也是一个“老手，”比较狡猾。耿飏加快脚步，他就加快步伐，紧赶几步；耿飏慢悠悠，他也迈起四方步。“不行！这样耽搁下去，就会误事。”耿飏心里有些着急。

忽然，他灵机一动，迅速转向东安市场。从西侧门进去后，不停地快速往里面人群里钻。这时，耿飏的对面走来一个戴灰色礼帽的男人，从个头、身材看和自己差不多，便向那人靠拢。就在耿飏侧身转到那人身后时，他迅速麻利地脱下礼帽换上怀里揣着的那顶黑色便帽，然后，疾步走进厕所，将大衣翻过来穿上。马上从厕所出来，抬头一望，已看不到尾随特务的踪影，很可能这家伙把那个戴灰色礼帽的男人当成了自己，跟踪去了。

“金蝉脱壳”后，耿飏又进市场从北门走出来，绕到宽街，在附近找到了陈家。接上陈家小女儿，立刻返回北京饭店，安排到自己房里，对外称是自己的女儿。两天以后，秘密将她送到张家口，交给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这次行动之后，耿飏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感到对付特务不能单单采取守势，一味地躲避、退让，处于被动地位；必要的时候也要以攻为守，攻守相济，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耿飏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天，耿飏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买了票正准备进去时，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却发现不远处有两个特务，显然是跟踪自己而来。他们发现自己暴露后，一个靠在墙边仰视天空，一个蹲在墙根，用一根小草拔拉着什么。

“狗东西！盯得真紧。”耿飏气忿地骂了一句。

然后，他返身又买了两张票，疾步走到这两个特务面前，大大方方将票递给他们，并用嘲讽的口气说道：“别在外面守着，风吹日晒多难受，走，一起进去看场电影。”

耿飏突然给他们来这一手，着实令这两个小特务抓耳挠腮，不知所措。面对送到眼前的电影票，伸手接也不是，不去接也不是，样子十分尴尬。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无可奈何地接过电影票。

俩特务涨红着脸，一边耿飏道歉，一边喃喃道：“嘿嘿嘿，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例行公事。”

“对对对！是例行公事……”

从此，无论在过道里还是大厅里，一碰到躲在那里的特务，耿飏就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有时还聊上几句，或者递一颗烟过去。时间久了，有几个特务跟耿飏都有些熟了。当特务头儿离开后，倒也乐意与耿飏拉呱拉呱。因此，常在这里活动的几个特务，相貌特征，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耿飏都了解的一清二楚。

有一天，耿飏发现那个姓王的特务没露面，就向别的特务打听。当他了解到是因为发疟疾在家休息后，顺路到附近的药店买了奎宁，来到姓王的特

务家。

“你怎么来了？”姓王的特务见耿飏买了药来看望自己，很吃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的代表，自己盯梢的目标会来看他，想到自己病后他们自己的人也没问过，眼睛顿时湿润了，他非常感动地说：“这活儿真他妈的没法干，吃苦受累不说，病了根本没人管。”

“你们的工作确实很辛苦，白天黑夜守着我们，连外出都跟着。”耿飏接过他的话茬说。

“我倒不用出外盯梢。”特务解释道：“因为我们这个组是负责饭店里面的。”

“你们分工还挺明确？”

“是啊！不但明确，而且还很细。”特务一高兴，竟然忘了坐在面前的人是谁了。信口说：“对长官您这样的人，都有专人负责。”

“哦，是吗？那我们的老李由谁负责呢？”耿飏见对方放松了警惕，连忙试探道。

“老李？是那个中将长官吗？”特务回答道：“他是由另外一个组的组长负责。”

当时，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特别任命了一批将校：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饶漱石等为中将，耿飏、宋时轮、陈士渠、李聚奎、黄镇等为少将，韩念龙、符浩等为上校……

“那么，叶剑英，就是我们的叶委员呢？”耿飏似乎漫不经心地接着问。

“这个……”特务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不光是派人盯梢了。”

“这个我们知道，”耿飏急于想知道是什么，就赶忙套他：“你们还用别的办法。”

“你们知道了！”特务既惊奇又狐疑。他又想，既然对方知道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他说：“听说这种小玩意叫什么窃……窃来着？”

“窃听器！”

“对，对，窃听器。据说这小玩意儿可了得，连隔壁房间里的说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翠明庄不由我们负责，所以那里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

翠明庄，是国民党方面专门给叶剑英准备的住处，在东华门拐角处。李克农有时也住在这里。

回到饭店后，耿飏立即将摸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克农。

李克农有些半信半疑，疑的是特务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机密透露给我们呢？他思索了一会儿，忽然说：“管他是真是假，先去检查一遍再说。”

于是，他们到翠明庄把每一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果然在会议室里找到了窃听器。原来，敌人的窃听器藏在地毯下面的小洞里。所以，尽管每日打扫卫生，竟也没有发现。

“你真行啊！连特务都给你提供情报。”李克农眯着双眼看着耿飏，用赞叹的口气，半开玩笑地说。

面对敌人这一阴谋，他们仔细商量后，又将窃听器放回原位，然后派人把国民党代表请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取出窃听器。阴谋败落，国民党代表面红耳赤，一脸尴尬，憋了好久，才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嘛，不关我们的事，是他们……嗯，我们回去一定查查……”

就这样，耿飏这位智勇双全的名将，不仅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而且在第

二战场上与敌特的较量中，也以其智慧和胆略连连挫败敌人，为后人留下了生动的革命佳话。

杨子荣智取杏树村

牡丹江地区大规模的剿匪战斗，是从辽南军区第4纵队第2支队到达牡丹江后展开的。当时，剿匪部队分成南北两路。北路剿匪部队于1946年2月初从牡丹江出发，一举攻下草甸子、桦林、柴河、五林等地，歼灭土匪李开江、张德林各一部。

至此，这一带就剩下杏树村、柞木台南沟和双河屯3个较大的土匪据点了。

据侦察得知，离板院以西30余里的杏树村，处于交通要道上，聚集着多股土匪共400余人，且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如能迅速攻下杏树村，对完成北路剿匪任务将起重大作用。

3月21日下午两点多钟，刚结束了杏树村以西30多里的板院战斗，牡丹江军区即令部队于次日拂晓前偷袭杏树村，要求全歼盘踞在该村之敌。

当晚9点钟，部队避开大路，沿着板院河以北的深山小径，向杏树村进发。经过6个多小时的艰难行军，插到了杏树村北山。

抬头望去，在不远的几个山头上，点着几处明亮的火堆，这是敌人设置的警戒线和卡子。

村子的东、西、北三面都是较开阔的稻田地，村子周围是两米高的土围子，村子的四角耸立着四座高大的炮楼，村子的东西各有一个大门，都用五六个人方能挪动的大木头顶着，围子外面有两米多宽的壕沟，壕沟外面到处设置鹿砦、木障。

如何攻下杏树村，打胜这一仗？

部队各级指挥员都在认真地考虑着。

“强攻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团1营老战士杨子荣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从访问板院的老乡和从杏树村逃出来的长工姜楞毛那里了解到：这一带群众对我党政策已有所了解，急切盼望搞土改，闹翻身。他们对为非作歹的土匪恨之入骨，而且又特别害怕在自己的村里打仗；村里的土匪虽然人数不少，但顽固分子不多，匪兵中大多都是当地群众被强征来的，家属都在附近，不愿为敌卖命，特别是遭我军多次打击后，士气不振。聚集在杏树村的各股土匪之间，由于形势日趋严峻，矛盾加深了，昨天板院战斗中被我军放回的俘虏，也在匪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兵临城下”给敌人心理上的震撼就更大了。

我军炮火试射后，从村里传来的妇女、孩子们的呼救声和匪兵们的叫骂声，使杨子荣又想起前些天兄弟部队打马桥河的情景。

马桥河也是白天打下的，我军与敌血战一整天，最后敌人虽然被消灭了，但我军部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近百人。群众的损失就更严重了，有的一家老少都惨死在战火中。

杨子荣一想起这次战斗，心里就很不安。在杏树村战斗打响之前，他仔细地琢磨着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趁敌人和群众处于我军炮火轰击后的混乱状态，闯进围子，依靠我军的声威，群众的压力，利用各股土匪和匪首之间的矛盾，争取匪众，孤立

匪首，迫敌投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样，既能取得战斗的胜利，又能减少我军和人民群众不必要的伤亡。

一个独闯敌营，迫敌投降的大胆方案，在杨子荣的头脑中形成了。

由于处境所限，杨子荣无法将自己的想法亲自向上级汇报。于是，他在征得战友同意后，当机立断，把枪交给战友，让他们在自己跃出雨裂沟、闯围子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向连里报告。

然后，他趁敌射击间隙一跃而起，用枪通条挑着一白毛巾向敌人方向飞奔而去。

当接近敌营时，他卧倒并以响亮的声音喊道：

“喂——弟兄们！不要开枪，我要找你们当官的讲话！”

敌人突然发现有一个八路从雨裂沟里站起来，挑着白毛巾向西大门靠近时，都被搞懵了。

一个匪军官楞了片刻，转惊为喜，向匪兵们喊道：

“不要开枪，放他进来，他是来投降的！”

门开了一条缝，杨子荣跃身进了围子。

“你是来干什么的？！”匪军官问。

“我是八路军的代表！你们被包围了，我来劝你们投降！”杨子荣理直气壮地回答。

一个家伙恶狠狠地说：

“好啊！我看你八成是来送死的！”

“要怕死就不来，来了就不怕死！我倒是为了你们的活路才来的！”杨子荣毫不畏惧，十分威严地说。

杨子荣见旁边一些匪兵用惊恐的眼睛望着他，就用胸膛顶开两面的枪口，微微向前跨了几步，庄重有力地说：

“弟兄们！形势是明摆着的，我们的政策，你们也是知道的，只要大家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匪军官赶紧大声制止说：

“跟我到连部去！”

杨子荣想：光给土匪头子们讲不行，这些家伙多是惯匪，只有瓦解了匪众，才能孤立匪首，迫其投降。

于是，杨子荣又提高嗓门对匪兵们说：

“杏树村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了，想活命的跟我走，一起找你们的连长去！”

匪军官在杨子荣前面领路，后面跟着一些匪兵。

“一个老八路进村了！”

消息很快在村中传开了。有些胆大的老乡陆续从屋里走到院子里看动静。

杨子荣边走边向群众热情地打招呼：

“老乡，不要害怕，我是八路军的代表，是来劝他们投降的。”

群众在纷纷议论：

“这个老八路一个人就敢闯进来。”

“人家关里来的八路，个个都是好样的。”

“还是劝他们（指本村土匪）把枪交了吧，要不然村的老百姓也要像马桥河一样倒大霉！”

“我看咱村的那几个头儿，家属都在这里，还好说点，就怕青背的许大虎和北甸子的王洪宾他们不干。”

杨子荣从这些议论中，进一步判断出：

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匪首与匪众有矛盾，本村的匪首与外村的匪首之间也有矛盾。而匪首中阻碍投降的主要是许大虎和王洪宾。杨子荣心里琢磨，擒贼先擒王，制服了许大虎和王洪宾，会对劝降起很大的作用。

当走到匪连部附近的小广场时，匪军官让杨子荣在那里等着，他自己去找连长。

杨子荣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站到广场旁边的一个石碾子上，大声地宣讲起来：

“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咱穷苦百姓打天下的，我们的大部队已经把村子团团围住了，他们要打下去，不仅他们自己被消灭，连咱们老百姓也得跟着他们遭殃。我已对他们当官的讲了，只要他们主动放下武器，他们的生命安全有保证，乡亲们也可平安无事。”

杨子荣的话，处处为群众着想，句句都点在了群众的心坎上，立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紧接着，杨子荣对匪兵们说：

“弟兄们，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是为谁打仗？为谁卖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而国民党反动派是欺压咱们老百姓的。你们有的家就在本村，继续打下去你们村会怎样呢？你们当中有的家在青背，有的家在北甸子，有的家在板院。你们自己的家乡都被我们解放了，可你们还在这里拿着枪与我们对抗，认真地想想看，能对得起你们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吗？”

杨子荣一席情深义重的话语也引起了匪兵们的同感。匪兵们也开始议论了：

“人家讲得对，咱们都被包围了，早晚得被消灭，还打个啥劲？”

老乡们见有八路在场，胆子也壮了。有人怨声怨气地说：

“邱会长，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你倒是出个头啊！”

杨子荣一听“邱会长”3个字，便不慌不忙地问道：

“谁是邱会长？”

立即有人把邱会长推到杨子荣面前，说：

“他就是俺们村的维持会长，叫邱振伦，我们都叫他邱老六，村里有啥事都是他出头。”

杨子荣上下打量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邱会长，严肃地说：

“我要提醒你，你既然是本村的维持会长，就要为全村的乡亲们负责，如果不听劝告，等我们打进来，后果你可以想一想看！”

“我明白，眼下的局势我看得清，有事长官尽管吩咐。”

杨子荣立即吩咐说：

“好吧，你立刻去搞几面白旗来，准备插到围子上去！”

邱会长应声去了。

正当这时，4个土匪头子提着手枪，匆匆来到杨子荣跟前，为首的一个气势汹汹地用手枪顶住杨子荣的胸口，不许他讲话。

杨子荣若无其事地问道：

“谁是青背的许大虎？”

许大虎一听点了他的名，立即怔了一下。

杨子荣又问：

“哪个是本村的郭连长？”

郭连长吃惊地点了点头。

杨子荣虽然没点王洪宾和康祥斌的名，但他的严厉目光已使这两个匪首胆战心惊了。

杨子荣大义凛然，厉声地说：

“杏树村被我军包围的局势你们是清楚的，硬打下去，你们的下场，也是明摆着的！”

说着，杨子荣指着村里被我军炮火打着的目标继续说：

“为了保护乡亲们，也为了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我们的大炮停止了轰击，只要你们主动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何去何从，由你们自由选择。”

许大虎是青背的土匪头目，是土匪团长李开江的得力干将；王洪宾是北甸子的维持会长兼土匪头子。他们都是被我军打败后，带着残部逃到杏树村的。

此时，他们色厉内荏，仍然挥动手枪喊：

“你不要吓唬人，还是你快投降吧！”

杨子荣针锋相对地说：

“你们别死到临头还充硬汉了，如果顽固到底的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接着，杨子荣向群众问道：

“青背的许大虎和北甸子的王洪宾他们不同意交枪，要在你们村打到底，你们看怎么办？”

一些勇敢的群众回答：

“我们不答应！他们要打，让他们带着他们的人回自己的村里打去！”

杨子荣指着匪兵们说：

“许大虎，王洪宾，你问问他们，看有谁肯跟着你们去卖命送死？”

王洪宾还充硬汉说：

“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听我们指挥，你能咋的？”

杨子荣针锋相对，说：

“你们拿他们的性命当儿戏，把他们当鸡蛋硬往石头上碰，能听你们指挥吗？你们要他们家破人亡，他们能甘心让你们任意摆布吗？”

杨子荣指着站在身旁的杏树村匪首说：

“郭连长、康副连长的家就在本村，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村子打个稀巴烂？”

本村的郭、康两个匪头目，在我军包围了村子后，已经动摇，特别是经杨子荣一摆利害关系，已有了降心。

许大虎预感到事情不妙，故作镇静地说：

“有李团长的命令，谁敢不听我的指挥！”

杨子荣也担心郭连长会被许大虎吓唬住，大声说：

“许大虎，你别作梦了！谢文东、李开江被我们打得东窜西逃，连自身都难保住，还顾得上你们？劝你别不识抬举！”

这时，郭连长心里明白，从眼下看不缴枪已无路可走，经康连副劝说已同意缴枪，此时看许大虎在自己地面上耀武扬威，已是火冒三丈。于是，便

冲上去吼道：

“姓许的，你太欺侮人了，打狗还得看主人！”

“你想咋的？”许大虎更火了。“你敢咋的？”郭连长也不示弱。

两个匪首端着手枪，虎视眈眈怒目相对。

杨子荣判断，现在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便灵机一动，对着小广场的匪兵们喊：“弟兄们，别白送命了，愿意放下武器的，把枪放到这里来，愿意参加我们部队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

经杨子荣这么一喊，形势突变，一个匪兵把枪放下了。

邱会长看到，一则有八路军包围之势，二则有这个浑身是胆的老八路撑腰，三则匪兵们已有降心，最后，他也摸准了郭连长的心思。于是，他壮着胆子，大声地对匪兵们说：

“弟兄们，为了杏树村的三老四少，我们欢迎大家缴枪！”

这时，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拉着当匪兵的儿子，劝说他们赶快缴枪；有的干脆把枪夺下来替他们交。

匪首们被这一突然出现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杨子荣看到许大虎还提着手枪在那里发楞，声色俱厉地对他说：

“许大虎，你要顽固下去与人民为敌，就是杏树村的乡亲们也不会答应的，我劝你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许大虎见大势已去，迫不得已地把枪往杨子荣跟前一扔，双手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王洪宾也慌忙地和其余几个匪头目一起缴了枪。

杨子荣见大事已成，对几个匪首吩咐道：

“赶快把你们的队伍集合起来，带到小广场，把枪都架到大街上，把白旗插到围子上去，搬开顶大门的木头，撤去鹿砦、木障，打开大门，迎接我们的大部队进村！”

几个匪首答应着，执行杨子荣的命令去了。

当围子的四周飘起了白旗时，我进军的军号声响彻板院河谷，部队迅速开进了村，杏树村战斗，由于孤胆英雄杨子荣的勇闯敌寨，就这样顺利结束了。

杏树村战斗的胜利，在心理上给敌人以很大震撼。部队刚刚开到柞木台南沟，那里的土匪便不战自溃。

随后，部队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攻下北路最后一个土匪据点——双河屯。

至此，北路土匪已被全部肃清，解放了牡丹江以北 100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和近百个村庄。

美国“吃法”

陈赓爱开玩笑，却不失风度。停战谈判时，他挂了个少将军衔。去北平开会，国民党中的黄埔同学见他从头到脚一身土布衣，便送给他一套呢子将军服，他谢绝了。他叮嘱部属，“不要被那些星星杠杠看花了眼，也别见好吃的撑个死，要注意气度……”

执行部请客的时候，陈赓在席上碰到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时，张治中任学兵团团长，陈赓是他手下得力的连长。但此时，两人却是站在敌对的双方。张治中看着陈赓那身土布衣服，说道：“谈判如果成功，中国就和平统一了。”

你们的军队装备将可以大大改善。校长一定会这样做的。”

“不会吧？他还会给我们改善装备？！”陈赓对蒋介石深有所知，但在朋友面前，还是注意了讲话的分寸。

“一定会的，校长讲了话是算数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开始还给了点军饷和弹药，以后不仅不给，还派军队打我们。你说和平统一后，他会给我们改善装备，老天保佑，但愿如此吧！不过，我不相信！”

正说着，几个美国军官插进来，指着刚端上桌子的西餐：面包、沙拉、牛排和黄油汤，夸耀着：“陈将军，我们美国人的伙食怎么样？”

“是不错。”陈赓听出弦外之音，他们无非是想听几句赞赏美国从中调停的功劳。他说着，托起面包、沙拉、牛排等盘底，统统倒进黄油汤盘里，拿起勺子搅了搅加重了语气说：“各位请吧，这不就是你们美国人的吃法吗？”

几个美国军官耸了耸肩膀，摊摊手，互相吐了吐舌头，他们看出陈赓将军是在讽刺他们“一锅搅”。

“陈赓呀！你还是老脾气、老样子啊！哈哈……”张治中也笑得无可奈何。

“是啊，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陈赓话中有话。人们望着那锅打旋的杂烩汤，嘴上无话，心中却敲开了各自的鼓。

血战守四平

1945年10月下旬，东北人民自卫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程子华任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任副司令员，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伍修权任副参谋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华北、华东、太行等解放区调集十万干部战士从陆路、水路日夜兼程开往东北。

这是一场比时间、比速度的争夺战。苏联根据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能保证把东北交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我军先期到达，加以接收，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也没有办法。由于我军动作神速，至11月底，东北我军连同先期到达者已达11万余人，从各解放区抽调的2万余干部也陆续到达。后扩大整编成21个师（旅），建立了10个军区，各部队陆续进入东北广大地区。到1946年1月，东北民主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至3月发展到31万人。

杜聿明在占领锦州、沈阳之后，为了防卫和巩固沈阳四周安全，作了如下部署：

第13军继续进攻热河；新6军进攻辽阳、鞍山、相机进攻本溪；第71军沿法库、康平北上，进攻八面城和郑家屯，形成进攻四平、长春的左翼；第52军进攻抚顺，保障新1军沿中长路进攻四平、长春，进一步攻占哈尔滨。

四平保卫战是逐渐形成的，照当时林彪的说法，是“且战且退”，是在“且战且退”中阻击敌人，迟缓敌人的进攻，给后方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政府所在地，位于中长、四挑、四梅铁路的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迭，西南郊河流纵横，

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鉴于此，中共中央、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出了关于保卫四平指示，认为“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8日又电示：坚决保卫四平。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导下，我军于4月16日在八城以南，开始四平外围作战，在金山堡、大洼地区消灭了国民党71军82师。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消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除师长逃跑外，几乎全歼该敌。

这一仗不仅提高了我军的胜利信心，也使敌人感到我军并不是那样好打的，挫折了敌人的锐气。

同时，由于87师的被歼，打乱了敌人进攻四平、长春的部署。

此时，新1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军的节节阻击，伤亡不少，以致迟迟不能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由郑洞国以副长官的名义指挥，进一步组织进攻四平。

郑洞国上任，虽然进攻有些进展，最后进至四平城下，然而仍是攻不进去，四平街还是在郑洞国的望远镜之下。

4月10日前后，郑洞国到开原指挥所，经过一番苦心策划，作如下攻击部署：

新编第一军，攻击目标是四平街，占领后，主力进出于四平街以北地区；第71军（欠第88师），攻击目标是八面城至旧四平之线，并进出于该线以北地区；第195师为总预备队，在新编第1军与第71军之间地区前进，随时准备策应新编第1军、第71军的作战。

15日，解放军在金家屯以北大洼附近将敌左翼之第71军第87师1个团消灭，并将其全师击溃，师长黄炎落荒南逃。

5月1日，党中央、毛泽东给林彪指示：

“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3方面同意的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中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

3日，党中央、毛泽东连续给林彪、彭真发出指示，要求坚决保卫四平。

敌我双方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这样旷日持久，不仅杜聿明安心不下，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不断来电催促，要杜聿明调兵遣将，加速对四平的进攻。与此同时，蒋介石利用军调部向我方伸出和平触角，提出和平条件：

“哈尔滨共管，长春、沈阳归国民党。”

这明明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我党我军根本不相信敌人不要哈尔滨。不过既然是谈判吗，就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我军也提出条件：

“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我们。”

这时，我军从敌人的无线电讯得知：新6军已奉命北开，71军已补充齐备，准备随时加入战斗。南满，除调云南部队的60军接替52军的防线，代

替 52 军守护从锦州到鞍山、海城的交通线，52 军也作为预备队加入进攻四平的战斗序列。

战局的发展的关键在我 3 纵和敌新 6 军那里。

我 3 纵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 3 纵没有估计到，就是前总也没有估计到新 6 军美械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机械化运输的优势，他们以小部队和我 3 纵部队在阵地上厮杀胶着，大部队使用 600 辆汽车装运，强行通过我军阵地。等我军发觉，用炮火追击已来不及了。

这样，新 6 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了 3 纵的防线，进入四平的右侧，而且很快就占领了西丰、平岗车站，然后又很快进占哈福车站，利用美械装备优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直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

这里，战斗十分激烈，我军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使敌人尸横遍野。我军几乎每一处阵地都是指战员与阵地共存亡，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街是不能不考虑全线撤退了。林彪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并得到批准。

我军各部队于 5 月 18 日晚撤出战斗，第二天敌人又用飞机、大炮轰击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进入四平，以 1 万余人的代价换得了一座空城。而我东北民主联军也伤亡 8000 余人。

我军付出了代价，为巩固和发展北满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我军却先后解放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

32 个日夜的四平保卫战，是我军进入东北后第一次大的阵地防御战，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作战。

在极其艰苦的守备中，我军以劣势装备挫败了用美械装备武装的敌人的进攻，狠狠打击了敌人企图用武力独霸东北的狂妄野心。同时也锻炼了部队，取得了打阵地防御战的经验，增强了打守备战的信心。中共中央、毛泽东在一次电报中指出，我军坚守四平一个月，“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意义的。”

敌人的威风则大受打击。据美联社当时发表的一条消息说：“杜聿明都不得不承认，四平街一带之共军力量其可怕处，出乎吾人意料。”

四平打赌

1946 年 4 月、5 月间发生的四平战事，惊动了“北平军调处执行部”。

军调处派出了 29 个停战小组，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各个地方进行调停。到东北的是第 27、28、29 三个停战小组，我方代表团副参谋长耿飏带领几位同志参加第 28 小组。

后来，耿飏这个小组被分到四平去。我方代表从沈阳坐火车，再坐汽车（因为当时铁路不能全线通车），先到铁岭。陈明仁的军队就在铁岭和铁岭以北的开原。我方代表一到铁岭，就被陈明仁软禁起来，在我方代表的住处放了哨兵，不让离开，并且不让我方代表的电台工作。也就是说，既不让我方代表到四平前线去，也不让我方代表与北平军调处我方代表团联系。

耿飏在与陈明仁的谈话中，以及我方工作人员对周围情况的观察中，大体了解到国民党有 1 个军或更多一些兵力包围和进攻四平。

鉴于敌众我寡和四平周围的军事态势，耿飏认为，如果我军在四平硬守，

可能会有较大伤亡。因此，耿飏拟了一个给北平军调处我方代表团的电报稿，其主要内容为：一、报告我方代表在铁岭被软禁的情况；二、建议四平我军，在完成了阻击、掩护的任务后，主动撤出四平，不与敌人硬拚。

电报怎么发出呢？耿飏苦思冥想，终于有了一个办法：利用美国人的电台发报。因为，陈明仁不能阻止我方代表与美国人接触；而美国人为了维护其“中立”、“调解”的假面具，也不能拒绝我方代表向北平军调处发报。美国代表虽想作梗，但又不得不表示同意。

就这样，我方代表团绕过国民党军队的监视，和北平取得了联系。后来得知，北平军调处我方代表团收到了电报，并把建议内容转告了我军东北前线司令部。

5月18日我军撤出四平以后，耿飏他们到了四平街，由于我军已经撤离，所以没有什么“调停”的工作要做，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和陈明仁辩论。

陈明仁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家离耿飏的老家相隔不到20里路，所以他称耿飏是同乡。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他在铁岭软禁了我方代表，但是表面上对耿飏还算客气。一进四平街，他还举办了个宴会欢迎我方代表。晚上，他还以聊天为名，非得拉着耿飏和他睡在一个床上不可。

耿飏想，一起睡就一起睡，看你聊些什么。

那一夜根本没有睡觉，陈明仁谈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吹捧国民党的生活好。陈明仁说：

“你看我们的生活有多好，吃的是美国的白面，穿的是美国卡其。”

耿飏就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全用外国货光荣啊？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搞自己的，爱吹外国的？”

第二，吹嘘他们打了胜仗，吹嘘国民党的前途“光明”。陈明仁得意洋洋地说：

“两年以后，不到3年，国民党一定消灭共产党。”

耿飏驳斥他：

“你们虽然背信弃义，向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到处碰得头青鼻肿。就拿四平之战来说，我们在以寡敌众的情势下，给了你们以沉重的打击，然后主动撤离，这难道能说是你们打胜了吗？至于说到内战的前途，我敢保证，不出2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陈明仁不服气，说：

“你敢跟我打赌吗？”

耿飏立即应答：

“当然敢”。

就这样，耿飏和陈明仁打了赌，这个赌，究竟谁胜谁负？以后的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过了2年多，即1949年8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中南地区胜利进军时，陈明仁随程潜在长沙起义。12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以后又任21兵团司令员、军长，并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0年初，耿飏被调到外交部，准备出国去当大使；出国之前，先请假回到离别了20多年的家乡看看。2月，耿飏回到醴陵，恰好陈明仁的部队就驻在醴陵。耿飏专门去拜访了他。

陈明仁一见到耿飚就说：

“四平的对赌，你赢了，我输了。”

接着，陈明仁举行了一个宴会宴请耿飚，可是这次与四平的宴会不同，四平的宴会参加者除我方几人外，都是国民党军官；这次的宴会参加者都是我军团以上干部。

在宴会上，陈明仁向大家讲述了他和耿飚在四平打赌的故事。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罢，一个个不由得哈哈笑了。

这是胜利者的笑，是自豪的笑。这笑，是用艰苦征战换来的。

叶挺罹难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惠阳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校。1919年初到福建漳州参加粤军，在第1支队任副官，后任第1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附。1921年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长。不久调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任团长。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任第4军25师副师长、第11军24师师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夏斗寅、杨森部袭击武汉，他临危受命，组织部队击退叛军。同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与党脱离了关系。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参与领导华中敌后抗战。1940年10月，指挥部队击退日军5000余人对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的进犯。1941年皖南事变中，指挥部队浴血奋战8昼夜。后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身陷囹圄，仍坚贞不屈。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

获释后的第二天凌晨，叶挺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向中共中央表示：“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是在他出狱后10个小时后写就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对叶挺的入党申请，中共中央极为重视。7日即加急复电同意接收其入党。当叶挺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电文时，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向往已久的那个亲切的称呼——“亲爱的叶挺同志”。

这时，他还不知道，这份电文是由毛泽东亲笔动手修改、润色过的。毛泽东怀着激动的心情，对这篇电文稿作了精心的字斟句酌的修改定稿。毛泽东把原文中“叶挺军长”这个称呼，先改成“亲爱的叶挺同志”，又改成“亲爱的叶挺将军”，再改回成“亲爱的叶挺同志”。

4月8日，叶挺与出席重庆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刚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归国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乘飞机由重庆飞赴延安。同机的还有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女等。

当日下午，途经山西省兴县东南黑茶山时，飞机遇浓雾失事，叶挺等13人及美国飞行员4人全部罹难。

1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飞机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致悼词《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同日，重庆各界也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追悼大会上沉痛地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署名文章。

韩先楚挥师夺鞍山

1946年5月，我军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作战部队5月18日撤离四平，实行战略转移。

不料，就在我军撤离四平的当晚，我军一作战科长投敌叛变。这个无耻的叛徒将我军撤退计划和盘献给了敌人。国民党前线总指挥郑洞国得悉实情，大喜过望，急命他所有机械化部队和陆军向我军分头并进，尾追不舍，连陷我双阳、梅河口、海龙、磐石、长春、农安、德惠、郑家屯等地。到5月26日，敌已分兵四路逼近吉林。我军迅速撤至松江以北，在百公里防线上，一面紧急布防，一面做撤出哈尔滨的准备。

就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发来特急电报：哈尔滨不能轻易撤退，北满迅速布防据守松花江。令四纵集中力量，在中长路沈阳、营口之间，乘敌南满空虚，选择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立即展开进攻，将北满敌军主力拉回南满。

毛主席的这一战略决策，立即变成我四纵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电报精神；研究如何将敌人从北满拉回辽南。

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斩钉截铁地说：

“用几个团向沈阳以南的中长路袭击敌人，是实现不了毛主席这个战略决策的，要打就狠狠地打，不狠打就不能将敌拉回来，我们要集中兵力向敌人背后猛插一刀。”

最后，纵队首长决定：战役的第一步先向东北大工业城市鞍山进攻，可直接威胁沈阳，得手后再向海城、大石桥、营口之线进攻。营口是蒋介石海上交通运输的战略补给基地。如将营口至鞍山线斩断，即切断了他的大动脉。敌得不到粮弹补给，即无法生存，这样使敌人不得不将北满主力撤回。

鞍海战役打响了。

鞍山、海城、大石桥是鞍海战役的3个主要战场。战鞍山，必牵一发而动全局，为确保首战鞍山的胜利，我军首先展开了鞍山外围战，在汤岗子切断海城与鞍山、在分水切断大石桥与海城之敌的联系，阻击海城、大石桥援鞍之敌。

韩副司令员用兵神速，草河口距鞍山百余里，24日出发，全军不顾雨淋路滑昼夜兼程，于25日上午赶到鞍山，迅速包围了敌军551团。辽南3团在汤岗子阻击海城之敌兵防备鞍山的敌人南逃，10师以29团为主攻，其他为助攻，上午10师到达鞍山外围。

鞍山市内房屋分散，城西平坦，敌1个团的兵力分散防御市区，是难以严密布防的。但东有铁架山，南有神社山，山地险，可为屏障，在两山顶端可瞰全市，敌以市府大楼——团部所在地为中心，北倚高大楼房，东南倚托两山构成了环形防御，关系全市安危的要冲是神社山。因市府大楼距离神社山只有几百公尺，因此敌人的防御就在山北脚下，敌人以此作为防御重点。我如攻占此山则可居高临下，直取市府大楼，控制全市，经过一番侦察，韩先楚副司令员、杜国华师长最后确定了以神社山为突破点。

时针指向5时，只见3颗红色信号弹腾飞空中，我军大炮开始轰鸣，顷刻间神社山浓烟笼罩，烈火熊熊，29团3营乘势突进敌人前沿，很快将敌人鹿寨铁丝炸开，3营的突击连，勇猛地突入敌鹿寨、铁丝网后，向山上奋勇冲去。当冲到半山腰时，敌人的碉堡生力复活了。敌机枪吐出火舌，子弹纵横交叉，将冲锋的部队压到半山腰和山脚下，郭嘉团长、刘凌政委赶紧重新组织火力封住正面敌人碉堡射击，掩护爆破组顺利地东南角两个碉堡炸开了，部队乘势冲了上去。殊不知敌人山上每个碉堡，以暗道沟通，并与野战工事相连，我军炸开的碉堡只是敌人的子堡，越过敌子堡，但敌堡堡相连。我军又被敌人逼了下来，几经冲锋，伤亡较大，时已子夜3点，尚未攻下神社山的主峰，这时8连3排张德福乘敌与我南面激战，率1个排绕向神社山北面，山南陡北缓，很快偷上敌人后山顶，突然背后开花，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经我一阵猛打，将死守在野战工事的敌人火力压住了，几个勇敢的战士趁机向封锁我正面的每个碉堡塞进了几颗手榴弹，只听轰隆几声巨响，碉堡里的机枪顿时哑了。我东南方的主力，趁机冲上了山顶，经40分钟的激战，全部解决了该山的敌人。这时，东方霞光万道，把刚刚结束激烈战事的阵地染得一片火红。

黄昏时分，我军赶到了海城，迅速完成了对海城的包围。

纵队的电台刚架起，就得到了北满敌新1军新3师、新6军182师、93军20师第4个师的兵力，正从松江地区南下增援的消息。

韩副司令高兴地向10师首长们说：“杜聿明和郑洞国失算了。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我们必须在敌人赶来之前坚决彻底地全歼184师，横扫南满。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为此，我们要军事攻势、政治攻势双管齐下，争取滇军潘朔端起义。蒋介石向来排斥异己，滇军是在蒋介石威逼之下，硬着头皮开来东北打内战的。在他们四面被围，势孤力单的形势下，起义是可能的。攻心为上，先礼后兵。”

根据韩副司令的决策，部队很快把敌人的俘虏、伤兵送回了184师，并叫他们带了许多宣传品，以瓦解敌军。同时还给师长潘朔端写了一封信，叫一个俘虏军官亲自送到城内。信的大意是：请潘师长以民族利益为重，弃暗投明。

5月28日黄昏，在一片苍茫暮色中，我军以主要炮火向玉皇山、双山子实施破坏性射击。只听炮声隆隆，但见硝烟弥漫。硝烟中，我军向玉皇山发起猛攻。

19时，30团夺取了双山子。28团2营占领玉皇山第一个山头。第二天，我28团1营已突进东门，29团和30团兵临城下。

184师面临今后出路的关键时刻，师长潘朔端决心走反蒋起义的道路。29日夜，海城国民党守军184师师部及552团共2700余人，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

海城战斗的同时，韩先楚副司令员命令10师和辽南3团于27日当天上午即向大石桥开进，歼敌近一个团。

此次战役歼灭和促敌起义达一个师。计：鞍山战斗歼敌184师551团；海城战斗促使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领师部及552团起义；大石桥战斗歼184师550团（欠一个营），总计毙伤敌1200余名；俘敌团长以下官兵2104名，起义官兵2712名。

很难对付的谈判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经几度商谈，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为监督停战，调处冲突，在北平建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及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36个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进行调处。

当时，驻地设在河北省泊头镇的是第18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从1946年2月底开始，担任这个小组的共产党代表。

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揭露国民党在美国支持和“和平”的幌子下策划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傅继泽在同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的谈判中，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因此，傅继泽被自己的谈判对手——美方代表米罗汉誉为“能言善辩、态度强硬、有作战经验、很难对付的一个谈判代表。”

5月3日中午，执行小组正准备吃午饭，突然，从泊头火车站西面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傅继泽马上判断是麇集在泊头镇的伪军向我地方武装进犯。于是，他向国民党代表葛洛夫和美方代表米罗汉提议：立即赶赴现场视察，以明真象。葛洛夫和米罗汉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拒绝，只好前往冲突地点。

前往途中，国、共、美三方代表，忽然被一群手执凶器的人围了起来，并且叫嚷着要见共产党代表。傅继泽心里明白，这些人都是国民党豢养的汉奸地痞流氓。

“我是共产党代表，你们要干什么？”傅继泽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苏俄不从东北撤军？”一个家伙首先发问。

傅继泽用蔑视的口吻，对他说：“苏联什么时候从东北撤军，我不清楚。要问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去问蒋介石，是蒋介石与苏联订的条约。我相信苏联会认真履行条约。”

“共产党军队为什么封锁泊头镇？”另一个家伙见同伙被驳得无言以对，不服气地跳出来，蛮横地问傅继泽。

“共产党封锁泊头镇道理很简单。”傅继泽据理驳斥道：“因为这里有建制完整的汉奸组织，还有上千的伪军。抗战八年间，他们为虎作帐，残害百姓，作恶多端。现在，他们投靠日本鬼子背叛祖国充当汉奸犯下的罪行，还没有清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然而，一夜之间，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国军，老百姓不答应。”

一提要清算汉奸的罪行，恰好刺痛了这帮家伙的痛处，他们马上围上来疯狂地喊叫道：“谁是汉奸？谁是汉奸？”

傅继泽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谁是汉奸，你们心里明白，老百姓清楚，我也知道。”

恼羞成怒的汉奸地痞流氓们，被傅继泽驳斥得理屈辞穷。他们见软的不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国民党和美方代表的面，向共产党代表公然进行辱骂殴打。

三方代表返回驻地后，傅继泽愤然向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提出严正警

告。同时，果断下了收拾这帮横行泊头镇及其周围地区的伪军的决心。为稳操胜券，给部队争取准备时间，傅继泽一方面就如何处理围攻殴打共产党代表事件，向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提出四条要求，并围绕这些要求展开谈判；另一方面，从地方武装部队挑选了几十名干部，以警卫共产党代表的理由，分批带进泊头镇，熟悉泊头镇地形地物，了解伪军情况。为了防止战斗打响后误伤美国人，或汉奸借机打死美国人，而嫁祸于我的不利局面出现，战前，傅继泽巧妙地将美方人员和国民党代表邀请到距泊头镇 25 公里外的我军司令部。从而，使我地方武装部队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举歼灭了泊头镇及其周围地区的伪军，并在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为此事，国民党当局大为光火，立即将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召回。

时隔不久，刚刚解放的泊头镇，突然飞来一架国民党 P—51 战斗机，对泊头镇进行扫射，当场将一位农民打死，并打死打伤牲口各一匹。

傅继泽马上请新来的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到现场观察。三方代表赶到现场，恰好这架敌机重又飞回泊头镇上空。

“这是什么型号飞机？”傅继泽故意问美方代表。

“P—51。”

“是美国飞机？”

“是……”话一出口，美方代表方觉上当，场面十分尴尬。

事件发生后，虽然铁证如山，但是，国民党代表仍在谈判桌上强行狡辩。胡说什么；“我得到可靠消息，共军昨天攻打沧县，所以今天飞机才来扫射泊头镇。”

傅继泽当即予以驳斥：“今天，我们亲眼目睹的是一架美国飞机，涂着国民党徽号来扫射泊头镇，打死居民。泊头镇百姓是不会忘记这笔血债的。”

美方代表见傅继泽重提美国飞机，神情紧张地连声说：“要进行处理，要进行处理。”

接着，傅继泽据理力争，迫使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在一项赔偿死者家属 425 万元（法币）的协议上签了字。

由于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在赔偿协议上签字，丢了主子的面子，不久就被召回。

半个月以后，新派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赴任泊头镇，并带来了赔偿费。

初到泊头镇，美方代表很是盛气凌人，竟然将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泊头镇政府抛到一边，嚷嚷着要亲自将这笔钱交给死者家属。他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傅继泽的坚决反对后，又蛮横无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笑的问题：“我不懂这个政府与难属有什么关系。”

傅继泽十分恼火地回进他一句：“你这个人缺乏起码的普通常识。”

经过一番较量和斗争，美方代表的气焰被打下去了，只好将带来的赔偿费如数交给了泊头镇政府处理。

皮定钧中原突围

1946 年 6 月，国民党 30 万大军准备向我中原军区进攻。

6 月 25 日，我中原军区 1 纵王树声司令员向 1 旅旅长皮定均、徐子荣作了扼要的指示：

“主力今晚就开始向西行动，你们赶快回去布置，要用一切办法拖住敌

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在3天内找不到我们的主要行动方向，等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就是突出重围的初步胜利，你们的掩护任务就算完成了。以后，你们按当时具体情况选择突围方向……。”

26日傍晚，1旅旅直单位离开白雀园向西出发。不久，天就完全黑了，雨愈下愈大，劈头盖脸地浇下来，使人睁不开眼睛。天空还在打着闪电，闪电一过，眼前黑暗更浓。

旅直部队不顾这一切，继续向预定目标前进。其实，他们所选择的隐蔽集结地点——刘家冲，离白雀园并不远，只不过12华里路，沿着潢麻公路向西南走两个小时就可走到。但是，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绕了很大的圈子。因此，他们从傍晚出发，到达刘家冲时，天已经快亮了。天明前，各团主力也相继撤到这里和旅直部队会合。

越过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潢麻公路后，部队顺着大别山脊背，飞兵东进！拐出一个山角，恰好太阳透出云隙，泻下万道金光，展现在我1旅部队眼前的真象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是属于商城县境的小山村，名叫瓦西坪。四周群山环抱，山坡上碧绿的梯田镶嵌着葱郁的松林，中间是一条清澈的溪流，垂柳拂着水面，有几间茅屋隐藏在绿荫深处；在阳光的映照下，青翠的稻浪，跳跃闪光的溪水，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真使人感到如入画境，心旷神怡。

徐子荣政委情不自禁地吟咏起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皮定钧抬头望了望东边那半截耸入云端的摩天岭，取出地图（他们没有军用地图，只有一本破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分省地图），从行程、方向和这座山的高度来推测，这座摩天岭想来就是地图上标明了高达1900米的大牛山了。

大牛山是鄂豫皖3省的交通锁钥，是我1旅东进的必经之路。皮定钧他们不能不担心万一敌人据险堵击的后果，而且这里又是大别山区最著名的封建土顽、伪商城县长顾敬之统治的地区。早在十年内战时期，顾敬之就是红军的冤家对头，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大别山人民一提起顾敬之，就恨得咬牙切齿，管他叫“顾狗子”、“顾半县”（他所霸占的庄园土地占了半个县）。顾敬之也确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敌人。他富有反共的罪恶经验，握有武装，豢养了大批的走狗爪牙，耳目灵通，地形熟悉。

皮定钧他们估计到要通过“顾半县”统治地区，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料定他会利用各个险口进行堵击。可是，4天来连续不断的山地急行军，干部战士已非常疲劳，大牛山一上一下近100里，不争取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很难坚持这一段艰苦的行军。

所以，皮定钧他们决定在瓦西坪稍作休息。皮定钧他们几个人信步走进一间茅屋。这间茅屋大概已很久没有人住了，里面的灶塌了，屋顶漏了，地上潮湿肮脏，简直落不下脚。警卫员很机灵，连忙搬来了几块干净的大石头，皮定钧他们才得坐下休息。刚抽了一口烟，突然枪声大作，中间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皮旅长赶紧跨出门，通信员迎面跑来报告说：

“敌人已经埋伏在东面那座山头上，和侦察连打起来了。”

“好小子，真是冤家路窄！”

这股敌人就是顾敬之的商城保安团，还有金寨保安团和国民党72军的1

个团。它们占据的那两个山头，恰似大牛山的两颗门牙，紧紧锁住了我1旅前进的道路。

“像撕布一样把它撕开，动作要快要猛！”皮定钧对1团团团长王诚汉同志说，“把情况告诉部队，不打开一条道，别处无路可走！”

我们的革命战士就是有这样的特点；一有战斗任务，精神倍增，什么疲劳、饥饿、病痛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战胜敌人，消灭敌人！他们冲进密林，飞上山岗，一霎间，枪炮声、喊杀声如巨雷滚动在山谷里。

敌人哪里是我军的对手！怎能阻挡这股奋勇的锐气？从我军组织攻击、发起战斗到攻上山顶，前后不到两个钟点，敌人就彻底跨下去了。

全旅沿着这条撕开的血路抢越大牛山。在山脚仰望队伍盘旋上升，真像是一条腾空的巨龙。当皮定钧登上大牛山主峰，一见这惊险万分的情景，既为部队脱离险境而高兴，又不自主地涌起一股骄傲的感情：我军的战士是多么伟大！

正在这当儿，天气骤变，闷雷在头顶滚动，狂风卷来了倾盆大雨，打得人睁不开眼。但是，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地向峰顶疾进。

我1旅还从群众那里，从俘虏口中，从敌人的文件、报纸上，大体查明了周围的敌情：敌人在西面正集中兵力追击我中原军区主力，在东南正积极准备对我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安徽境内只驻有为数不多的广西军队。

于是，皮定钧、徐子荣当机立断决定趁敌人后方空虚，并对我1旅捉摸不定之际，以飞跃的速度跳出大别山，横越皖中平原，向苏皖解放区前进！

7月7日，我1旅在霪雨中沿漫水河向东挺进。

皮旅长知道，青风岭是大别山的必经关口，是从湖北到安徽的最后一站，形势万分险要。它的北麓紧靠着淝河的支流，河南岸都是徒立的峭壁，南面是天柱山，远远望去真像是天柱一样，直插云霄，青风岭就是它伸出来的一根横梁。这是一道天然防线，敌人必然会利用它进行堵击，而我军要是冲不过这一关，后面的追兵再堵住退路，我军将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从千笠寺到青风岭有一条几步宽的人行大道，部队刚转出山脚，前面就传来了枪声。不一会，2团通信员报告说：

“青风岭被敌人占领了！”

果然不出所料。皮定钧他们奔到山脚，隐蔽在一座桥墩下，观察着地形和敌人的动静。青风岭仿佛一堵巨墙横挡在面前，山上林木茂密，看不清敌人的分布，只看见两边迤迳的分水岭斜面若隐若现地有许多临时工事；山的坡度很陡，中间一条唯一的石板道已被敌人的轻重机枪封锁得水泄不通。

我1团隐蔽运动到山下，发起了两次攻击都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敌人看到我军两次攻击都失败了，得意忘形在大喊大叫：

“你们插翅难飞啦！”

1团被敌人的火力压在岭下，上不能上，退又不能退，相持不下，而拖延时间却对我军不利。皮定钧决定命2团从右翼轻装上山，迂回到敌人侧后，配合1团夹击敌人。

2团上山的地方是一片几丈高的峭壁，山上丛林密如梳篦，根本无法插足。但是，愈是这样的地方，敌人愈是麻痹大意，防备疏忽，2团的战士们用绑带、扁担和牲口身上的绳子攀上峭壁，然后，用砍柴刀劈林开路。他们全身被树枝、荆棘、尖石刺割得皮破血流。这些英勇的战士终于征服了天然障碍，登上了青风岭右翼主峰，出敌不意地向敌人侧背发起了冲锋！

西斜的阳光洒下的金辉照得山顶亮堂堂的，皮定钧清清楚楚地望见这幅动人的胜利画面：

一路冲锋队伍的前面，几个机枪射手平端着机枪，迈着大步，边走边扫射；另一路的战士们同时甩开一排手榴弹，随着巨响和升起的浓烟，喊着惊天动地的杀声，冲进敌群，展开了白刃格斗。

这时，1团也从正面顺着石板道直冲山顶。一个头部裹着绷带的伤员甩脱搀扶他的战友，一把夺过自己的步枪，一声不响地跟着冲去。有些战士因为身体虚弱，冲锋太猛，一上去就昏倒了。

青风岭打下来了，敌人逃窜了。我1、2团跟踪追击了20多公里，沿途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伤兵、枪支和弹药。等旅部上山时，只见一排排俘虏站在道路两旁：耷拉着脑袋，像蚂蚱似地躬迎我旅部首长。

接着，1旅突破敌人在深河沿置的防线，歼灭了这里的民团局子。

1旅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克服了重重天险，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击拦截，现在终于跃出了大别山。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1旅歼灭在大别山的狂妄野心，也就彻底破灭了！

就在我1旅和大别山告别的时候，又获得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正慌忙调集3个正规师和10几个保安团，重新布置数道防线，企图堵击我1旅于皖中平原。

7月13日夜，天气晴朗，月光皎洁，大地镀上了一层银色。我1旅这支铁流从大别山倾泻而下。

15日拂晓，我1旅已抵近了六合公路上的官亭镇。因侦察队留下的同志走错了路，没有和大部队联系上，大部队就不了解沿路的敌情。旅首长估计六合公路是皖西的交通动脉，合肥、六安又都是皖中重镇，敌人很可能在这来交通要道上派重兵把守，严加封锁，我军不能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布置。我军派出一支坚强的部队攻占官亭，拔除障碍；东路的1团直逼合肥外围，防备合肥之敌出动；西路的2团逼近，“（安城下，监视六安之敌；中路的3团和旅直在官亭附近越；土公路。

出乎意料的是，敌人在六合公路上并无兵力防守。官亭镇内只有民团局的100来名局丁。当我军3团直冲jH街道时，他们还赤身裸体在睡大觉呢！战士们开他们呐玩笑说：

“喂，快起来，共军来了！”

他们有的翻个身，不乐意地咕哝着什么。有的发起脾气来：

“你吵什么！共军又不是飞毛腿！”

在他们想象中，“共军”还远在数百里之外，等到战士们哗啦啦拉动枪栓，揪住他们的耳朵，他们才像被火烧着似地惊跳而起，一个个像泥塑木雕的一样。我军命令他们用电话向合肥、六安报告“这里平安无事”，“附近没有敌情”，来“安慰安慰”敌人；对方在电话里还厉声督促：“要小心防守，一有情况立刻报告！”

就在这里，我们3路纵队浩浩荡荡地通过了六合公路。

突围的最后大关终于到来了！红心铺这个小镇，离津浦铁路只有40几公里。跨过津浦路，再走半天的路程，就是苏皖解放区了！

天亮的时候，旅直过来了，1团也赶到了。但是，部队刚过了一部分，轰隆！轰隆！轰隆！敌人从南面飞快开来了一列装甲火车。车上的轻重机枪的火舌泼水似的扫来，子弹打在铁轨上进溅起阵阵火星。这时，碉堡里的敌

人也壮起了胆子，射出密集的子弹，使 1 团过路受到严重威胁。

装甲火车愈来愈近了！1000 米、500 米、200 米、50 米……我军的工兵蹲在护路沟里，紧瞅着庞然大物。“炸！”手摇发电机嗡嗡一响，紧接是一阵爆炸声，烟柱腾空升起，火车呜呜狂鸣，来了个急煞车，车厢发出了铿锵的撞击声。皮定钧、徐子荣远远望着这精彩的一幕，都不禁同声问道：

“铁轨炸断了没有？炸断了没有？”

可是，铁轨并没有炸断。因为，我军仅有的炸药太少了，只有 8 块黄色炸药，而且又经日晒雨淋，有的失效了，由于药量不足，铁轨只拱起了一小节，装甲车吓了一跳，倒退几百米。然后，又隆隆开来，把 1 团切成两段。

与此同时，从明光、管店和滁县方向出动的敌人，分 5 路从两翼运动，构成了钳形攻势。我 3 团截住了滁县方向的敌人，2 团截住了明光、管店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已经过路的 1 团战士们，又回过身来配合路西的部队，从两边向装甲火车用火火猛烈的射击。

我军集中了全旅的迫击炮轰击敌人的碉堡和装甲火车，掩护着 1 团。霎时间，枪声、手榴弹和迫击炮的吼声，响彻云霄，想和这钢铁巨兽决一雌雄！装甲火车里的敌人害怕炸毁了他们的装甲火车，开足马力向明光（嘉山）逃去。

很快，1 旅到达苏皖解放区。

经过 24 天艰苦的征战，我 1 旅终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 1000 多里的追击堵截，征服了无数自然险阻，克服了一切艰难困苦，横跨安徽大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对于皮旅中原突围，毛泽东、周恩来都作过高度评价。1967 年，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曾对皮定钧说：“皮旅中原突围，中央是当作一个方面军使用哩！”

李先念巧使“空城计”

1946 年 6 月我军中原突围前夕，我中原军区独 2 旅驻守在宣化店以南吕王城一带，担负着守卫中原解放区南大门的重任。

6 月 23 日，独 2 旅突然接到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吴诚忠旅长、张体学政委和熊作芳副政委马上赶到宣化店。

宣化店，地处鄂豫边界礼山（今大悟）县境内，是一个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南北街，住着百十户人家的小镇。因为它是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驻地，一时名扬中外。镇西边是一条与街道平行的小河，名叫竹竿河，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就住在河的东边。

河西有一所学校，当时作为“国际招待所”，住着执行军事停战调处任务的第 32 执行小组，两地相隔不到 1 华里。在宣化店地区周围，敌人部署了 30 多万军队，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军的一切行动，妄图一口吃掉中原我军。驻在这里的美蒋代表，实际上就是以合法身份安插在我军眼皮底下刺探军情、监视我军的“眼睛”。

李先念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正在中原军区司令部作战室里等着他们。平时爱说爱笑的李司令员，今天却显得异常严肃。他一见吴诚忠他们进来，就马上交待任务说：

“中央已决定我中原军区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从 24 日起开始秘密

集结，28日拂晓前集结完毕，29日黄昏后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

接着，李先念加重语气说：“你们独2旅和1纵1旅的任务，是掩护主力和军区机关向西突围，1旅负责北面，你们负责南面，要特别警惕河口方面的敌人，待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后，你们再向东突围，到苏中解放区去。”

说完，李先念又走到作战地图前，指着吕王城以南一带地形说：“佛塔山是中原军区的南大门，要特别警惕河口方向的敌人向我发起进攻，坚决守住佛塔山。佛塔山一丢，吕王城不稳；吕王城一丢，宣化店就直接受到威胁。”

接着，王震副司令员又向他们作了具体交待。他强调指出：

“当前最重要的是保守军事机密。万一泄露了机密，敌人就会提前对我们发起总攻，这是关系到整个突围计划成败的大问题。”

为了抓紧时间部署，吴诚忠旅长先赶回旅部安排。

李司令员把张体学政委和熊作芳副政委带到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的办公室，他神情严肃地对张体学说：

“为了使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和直属部队，提前安全隐蔽转移到平汉路东附近，决定让你带一精干部队和必要的参谋人员，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的驻防，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你就以中原军区警备司令的名义，与32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周旋。待我首脑机关和主力转移后，再把他们护送出去。”

接着，郑位三政委又特别强调说：“宣化店是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地，敌人的眼睛始终盯着它。在我们未转移前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李司令员还特别提醒张体学，驻宣化店的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实际上是国民党安插在宣化店的“眼睛”，必须严密注视他们的行动。交待完任务后，他风趣地对张体学说：“你就在宣化店唱一场‘空城计’！”

听完李司令员的这番话，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受领任务后，张体学、熊作芳知肩上挑着千斤重担，能否完成任务，直接关系到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的安危和主力部队突围的成败。在返回旅部的途中，他们反复考虑着如何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2天下午，张体学政委和吴诚忠旅长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体学政委首先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和军区首长的指示。他从国民党的四面包围态势，讲到中央、中原军区关于突围的部署，从主力分南北两路向南突围，讲到独2旅所肩负的重任，要求大家顾全大局，同心协力，英勇奋战，为了全局的胜利，准备作出必要的牺牲。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军区首长把如此艰巨、重大的任务交给独2旅，是对全旅的无比信赖。纷纷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佛塔山，唱好“空城计”，绝对保证首脑机关安全转移，掩护主力胜利突围。会议还研究了完成掩护任务后自身突围的方向、路线和会合点等问题，决定在29日晚分三路向东突围，第一个会合点是岳西、太湖边的冶溪河，第2个会合点是岳西的鹅落坪，然后向五河挺进。

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使军区机关出敌不意地突出重围，张体学决定带一支精干部队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警卫任务，掩护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和主力安全隐蔽向西转移。于是，一场“空城计”就形成了。

这场“空城计”，是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亲自部署并导演，独2旅政委张体学担任主要角色，在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比当年诸葛亮智退魏兵摆的那场“空城计”要复杂得多，不仅兵临城

下，而且城内还安插有敌人的“眼睛”。为了抢在敌人之前作好准备，6月25日张体学先带少数精干人员赶至宣化店，接替中原军区司令部的“办公室”。然后即调旅警卫营1个排，携带全副武装，迅即赶赴宣化店，接替军区机关驻地的所有“门卫岗哨”。

当他们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下榻时，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向张体学面授机宜，要他就在此坐镇，使这里的工作照常运转，并以中原军区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在此办公。从此，这里虽换了人员，但形式依旧，不仅司令部的牌子照常挂着，而且里面有人照常办公，直通32执行小组的电话也照常保留。

6月26日凌晨，旅警卫营领导向本营1连传来旅部紧急命令，要1连派一个干部带1个排，携带全副武装，迅速赶到宣化店，跟随张体学政委执行警卫任务。1连副指导员张凯辉经与连长陈义德商量，决定由张凯辉率领1排前去执行这个非同小可的任务。这个排军政素质好，战士老、党员多、觉悟高、忠实可靠，曾先后跟随张体学等旅首长迎接警卫过从汉口到宣化店途经吕王城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完成任务十分出色。这次听说要到宣化店去执行警卫任务，一个个兴高采烈、斗志昂扬。上级虽然没有动员突围，但从这次不寻常的任务来看，大家估计要突围了。大家抓紧时间吃饭，立即出发，向宣化店急进。

当1排到达宣化店时，为了不让美蒋代表察觉我军的行动，他们就住在镇上靠南头东边的几家商店里，隐蔽在店铺后面活动。部队住下后，张凯辉和吴排长立即赶到中原军区警备司令部报到。根据张体学政委的指示，立即带领战士分别接下了中原局，中原军区首长和司令部驻地的警卫岗哨。

至此，由张体学“主演”的“空城计”，已准备就绪，全面开始了。

这时，虽然军区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还没有撤走，但1排的到来，已为他们安全秘密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突围行动严格执行了李司令员关于“出敌不意”的指示和要求，组织准备工作相当严密，行动也非常秘密。出发时间选择在黄昏后至午夜，行军路线不走大路走小路，而且是分梯次伪装撤离。连宣化店镇上的居民都不知道我中原主力已开始突围，只有我军机警的哨兵才知道他们的去向。

这里特别是值得记述的是，26日傍晚，李先念司令员在张体学的陪同下，从军区驻地走出来，漫步在宣化店街头，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谈笑风生，镇定自若。这一非同寻常的散步，好像是他在默默地向宣化店群众告别，更像是他正在“导演”自己设计的“空城计”妙计。这个行动，给住在河西“国际招待所”的美蒋代表吃了一颗“定心丸”，作了一个政治姿态：你们不是说共军要突围吗？可是我这位司令官还在此闲庭信步哩！

这时，宣化店依然那样宁静，街上人来人往，商店照常营业，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其实，我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已经秘密转移了，留在这里的只是我独2旅的一支精干小分队，宣化店真正变成为一座“空城”了。

然而，敌人是狡猾的，他们经常施展讹诈伎俩，试探我军虚实。前几天，蒋方代表突然向我方提出所谓“备忘录”，诡称：“据了解，共军集结，准备突围。”

我方代表任仕舜中校当即予以驳斥：“纯属造谣。”直至26日傍晚，当看到李先念将军还在宣化店街头散步，部队照常出操、站岗时，他们才相信了。

敌人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为了摸清我军行动的底数，美蒋代表又使出

了新花招。28日，美方代表突然向我方提出：“要求会见李先念将军。”

这一下可给我方出了个难题：李司令员早已离开宣化店，怎么能回来会见美方代表呢？张体学以警备司令的名义通过我方代表答复美方代表，“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

这一招十分巧妙，既没有说不会见，也没有说立即会见，而是采取拖延时间的策略，为我军胜利突出重围争取了时间。

这时，我独2旅4团2营指战员正在顽强地坚守佛塔山阵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牢牢地守着南大门，而我军主力正向平汉铁路挺进。

为了继续迷惑驻宣化店的美蒋代表，张体学决定再从独2旅前线抽调6团1营赶到宣化店“驻防”，加强这里的警卫力量。

29日上午，美蒋代表及随行人员在我方代表任仕舜的陪同下，跨过竹竿河上的木桥，来到河东镇街上，接着又转到镇外山岗上。他们看到宣化店依然是一片平静，好似往常一般。在中原军区机关门前，站着威严的门卫哨兵，办公室里传出“滴滴嗒嗒”的发报声；大街小巷，行走着一队队巡逻执勤的战士；操场上，整齐的步伐伴着雄壮的口号，呈现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

美蒋代表个个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以为共军的首脑机关仍在宣化店，他们“一举围歼”中原共军的美梦就要实现了。然而，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已撤离宣化店3天了，正在向西挺进。

这真是一帮愚蠢的家伙。

当天下午，正当我军准备冲越平汉铁路封锁线时，我方代表为答谢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调处工作的“成绩”，特举行宴会，招待32执行小组全体人员。竹竿河畔的“国际招待所”，洋溢着一片“友好”的气氛。那时，我1营的全体指战员仍在宣化店周围站岗、放哨、巡逻、执勤，扮演着“空城计”中的重要角色。

正当美蒋代表酒意正酣的时候，张体学政委带着警卫员突然来到了“国际招待所”，庄严宣布：“由于国民党军背信弃义，向我发动进攻，李先念将军已率中原军区主力突围！”

这一庄严宣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惊得美蒋代表无不目瞪口呆。

“诉苦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

1946年2月9日，冯恺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3纵队第7师第20团第3营任教导员。

辽东军区第3纵队是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以冀热辽部队和鲁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为骨干扩编的队伍。武器装备虽好，但兵员成份复杂，既有一些入伍不久的新兵，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组建后，随即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战役。在从四平撤退到辽东辉南、柳河一带集结的过程中，经过连续20多个昼夜的行军、作战和抢修工事，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

冯恺来到3营后，就参加了打国民党精锐部队新6军的沙岭子战斗。他在战斗中发现：该营战斗力较差，个别士兵不敢冲锋；且由于战斗艰苦，条件恶劣，又出现了少数士兵“开小差”现象；连排干部普遍反映“兵难带，仗难打”，有的干部三天两头要求调走。如何从政治工作上去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当时各级领导面临的严重问题。他想尽了办

法，做稳定部队的工作。行军时不骑马，帮助老炊事员挑担子；连、排干部也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战士。这样虽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人，感情也越来越接近，但他心里仍然没有底。以后的战斗将会更加残酷，这样的部队能经得住考验吗？

到了6月，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因此，有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当时，关内在大打，很明显，关外的“和平”只能是暂时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教育整顿部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可是用什么办法教育部队呢？

正在这时，师召开了建师以来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全师政工干部都参加。会议头两天师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总结。然后师政委李伯秋到会作报告，讲的是“论阶级教育问题”，阐述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已由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与代表剥削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变了，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心也应当转变为阶级教育。这个报告说理透彻，指导性很强，冯恺全神贯注地听着，感到很解渴，几个月来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他们营与会的几名干部讨论得十分热烈，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组织教育。可是，一讨论到搞教育的具体方法，大家就卡壳了，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大家感到阶级教育问题“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上没解决”。

回到营里，冯恺开始考虑如何落实师里要求。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3营的复杂情况，使他感到应该马上搞阶级教育。他召集连干会议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教育内容就这样定下了。可是，教育如何搞法，大家还是想不出办法来。正在这时，师宣传科发下来一套学习讨论题，都是针对部队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来的。我们逐题议论，有一个题目是“谁养活谁？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大家感到这个题目好，抓住了“根本”。全营（第8连在外）就在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当时叫作“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一个新生事物：“诉苦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场应运而生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

“谁养活谁”的辩论一展开，空前热烈，众说不一。说“穷养富”者有之，说“富养穷”者有之，说“穷富互养，谁也离不开谁”者也有之，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争就是两三天。渐渐地，分为两条阵线：一部分人认为穷人养活富人，讲了不少道理；另一部分人认为“富人养活穷人”。有个战士竟举出了自己闯关东生活无着，天冷了，冻僵在一个地主家门外，被地主救活了，就留在他家干活吃饭的事例。因为那时人们还不会从经济关系上认识问题，于是形成了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会场上僵持着，长时间“冷场”，间或出现“你们没理了，投降吧”的起哄声，但没有对立情绪。虽然不断“冷场”，但战士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因为他们也急着寻求真理。

就在这“冷场”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一天，一个朝鲜族老大娘找冯恺说：“教导员，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机枪连的同志想家都想得抱头大哭，饭都不吃了！”冯恺很吃惊，马上想去机枪连看看。恰好机枪连指导员刘子政来了。他两眼红红的，情绪激动地说：“我们连今天开会时出了个新情况，2班副班长任纪贞发言时，他从算经济帐讲起，他父亲给地主放了200只羊，每年繁殖的羊羔就收入300多元，但地主只给30元。老人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生病还得干活，累得吐了血，临死前求地主家借点高粱面做点糊糊喝，地主婆不但不给，还张口辱骂。”讲到这里，就诉说不下去了。他失声痛哭，引发了全连官兵的悲痛，许多同志也一边哭一边控

诉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进而责备自己糊涂，受了这么多苦还说财主是好人，说“富人养活穷人。”还有的捶胸顿足，骂自己忘了本，想开小差……等等。全连悲声冲天，如洪峰泻口。刘子政含泪汇报，触发了冯恺的悲痛感情，同时也不由得兴奋和激动起来：“诉苦”是个好办法！他们营的根本问题可以解决了！马上召集各连干部来开会，大家齐说“太好了！”接着，让任纪贞到各连诉苦。连“诉苦”这个词，都是在会上有人随意提出来的。第9连指导员赵绪珍从中受到了启发，用驻地老佃户张大爷穿了14年的一件破棉袄和安口镇黄区长的一床破被子等事例，对连队进行两个阶级、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发动大家“挖苦根”。诉苦教育，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官兵的觉悟，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

1947年1月，敌人向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3营的干部战士表现得很勇敢，战斗力也明显增强。这次战斗中，3营9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入敌阵，猛打猛冲，俘敌10余人，成为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纵队刘西元副政委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房天静回答说：“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过去虽然受苦但认不清敌人。连队开展了诉苦教育，才提高了觉悟的事汇报了。首长听了很高兴，认为是件新鲜事，就派人到3营进行调查了解。于是，“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首长和机关的注意。师、团机关帮助9连总结了诉苦教育的经验，把他们的做法概括为：“吐苦水”，“挖苦根”，“查忘本”，“下决心”，并向全团推广。纵队政治部认为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派人同师、团一起研究和充实九连的经验，又向全纵队作了介绍。辽东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第3纵队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陈云指出，这是部队教育的方向，要把诉苦教育和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在全区推广。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高度评价了诉苦教育。认为“这在部队教育工作上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虽然还是开始，但这确实是部队教育的革命，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教育部队的思想，……是部队教育的群众路线问题和部队教育的方向。”（罗荣桓：《部队教育的方向》）并向全军推广。随着这一做法不断发展完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在1947年9月28日，就东北部队进行土改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这一经验，亲自修改，转发全军，从而促进了全军诉苦运动的全面开展。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全军各部队在土地改革政策教育中，普遍开展了诉苦运动，并结合整党的要求进行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活动。

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西北野战军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部队进行“诉苦”、“三查”运动的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工作七十年史》第3卷，第175页）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区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深刻阐明了“诉苦”、“三查”运动的伟大意义，并首次将其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

诉苦教育是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中开出的“奇花异果”，也是阶级教育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诞生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

不难。群众自我教育，启发基本觉悟，形成的力量是无穷的。

刘善本驾机起义

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第8大队第35中队上尉机长刘善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心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蓄意挑动内战，妄图在国内重燃战火，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内战，于1946年6月26日率机组同僚10人，驾驶B—24型轰炸机一架，自四川成都飞抵延安。到达延安后，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内战；号召国民党空军朋友拒运打内战的军火和装备。6月29日，刘善本机组全体人员（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出席了延安军民召开的欢迎大会。刘善本起义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第一大队副大队长。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创建，刘善本被任命为校长。

刘善本机组起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军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给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当头一棒，也给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边区军民以极大鼓舞，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范例。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到1950年1月，国民党空军先后有69人、26架飞机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七战苏中第一捷

1945年9月，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新四军奉命从江南北撤。此时，新四军第3师已奉命向东北进军，新四军第2师、第4师、第7师主力和从江南北撤的叶飞纵队奉命北调山东，接替由山东开往东北各部队的防务。这是党中央、毛泽东的一着高棋，不仅在政治上争取了各阶层群众的支持，而且支持了发展东北，缩短了南方战线，实现了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战略集结。

10月，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个战略区的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和华中部队的指挥机关。另在华中（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组成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11月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6、第7、第8、第9等4个纵队。

为了准备歼敌战场，我华中野战军曾在1945年12月发起高邮战役，集中兵力，在南面攻取高邮城，收复高邮以南至邵伯镇的运河沿线地区。为保障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扫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对加强苏中与淮南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我军控制了陇海铁路徐海段，第一次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并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

接着，华中军区将第8纵队扩充成为新四军第1师，第6纵队扩充为第6师，并将华中第5军分区部队和一部分投诚部队编为第10纵队。

随着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7月初，中共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军进攻。于是指示华中军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

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13日，军委又电示：“苏北（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北部）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中、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军委还提醒道：“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这使苏中领导感到，大战将从苏中开始。苏中战役实际上具有解放战争战略初战的性质。军委要苏中军区“先打几个胜利仗，看出敌人弱点。”实际上赋予了苏中作战以战略侦察的任务。

敌人进犯苏中解放区的企图，是首先攻占我苏中南部地区，然后在淮南及徐州之敌的配合下，进占两淮，速战速决，一举占领我苏中、苏北、当时我苏中有第1师（2个旅6个团）、第6师（2个旅6个团）和地方武装上升的第7纵队（4个团）、第10纵队（3个团），共19个团，约3万余人。敌人兵力为12万。

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求胜并非易事。

但是，敌人有两大致命弱点，就是他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

对于敌人的骄狂，下面举一小例，即可见一斑。这年的3月2日，由中共、国民党、美国三方组成的“三人小组”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时，粟裕和谭震林随陈毅军长飞徐州向周恩来汇报，并向“三人小组”控告蒋军违反停战协定，侵占我解放区若干城镇的罪行。粟裕返回的那天，在徐州的国民党军队负责人到机场送行。当时，一批美制P51型蒋机在起飞、降落，啸声刺耳，有意耍弄“威风”。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的副参谋长站在粟裕身边，趾高气扬地笑指天空说：

“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

显然，这是欺负我军还没有空军。

粟裕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冷冷地笑着说：

“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下到地面上来抓俘虏。”

敌人以为我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是打了“败仗”，同时停战期间他又侵占了我一些地区，更以为我可欺，加之受其高级将领的欺骗宣传，以致盲目地以为我军不堪一击。“骄兵必败”，这是蒋军的一个致命弱点。

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粟裕这位著名的军事家选择了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为初战的作战地域。

选择在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似乎不符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常实行的诱敌深入传统战法。但粟裕认为，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而是歼灭敌人的一种手段。诱敌深入也不是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唯一打法。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

这，正是粟裕的高明之处。

选择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是从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出发的，又是分析了敌我双方条件的，苏中战役选择解放区前部作战，粟裕主要是基于下列的考虑：

华中解放区是抗日战争中广大军区浴血奋战的结晶。经过日军无数次的“扫荡”、“清乡”，我军都坚持下来了。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如果不打几

个胜仗就放弃大块土地，这对党政军民都是不好交代的，对士气民心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这是战争的指导者所必须充分考虑到。苏中土地改革开始不久，为了保证这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的进行，也需要在苏中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来掩护。

根据中央意图，苏中战役对于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的作用。国民党气势汹汹地向我军打来了。他的战略意图和部署，作战行动和手段，以及战斗实力等等究竟怎么样，都需要摸一摸。在前部打仗，可以迫使蒋军提早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便于我军进行战略侦察。

这时，粟裕想起了毛泽东的一个精辟、正确的论述：关于战争，“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于我有利，先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打几个胜仗，是必要的，也是具备了条件的。

于是，粟裕迅速定下决心：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

作战地区选定之后，就是选择打击目标和确定反击时机了。

蒋军即将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7月10日，我军已确悉蒋军将在三、四天内分4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

根据敌情，粟裕认为，打宣家堡、泰州这一路最为有利。该路敌军整编第83师原番号是第100军，是蒋军嫡系部队、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但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军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7月10日，粟、谭定下决心，集中第1师、第6师、第7纵队于宣、泰地区，只用第1军分区的部队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蒲北犯之敌和由泰州东犯之敌。宣家堡、泰兴两地各驻敌军1个团，我军各用1个师（2个旅6个团）的兵力去打，形成了与敌人6比1的兵力优势。

7月13日，我1师部队在陶勇指挥下，由如皋到达宣家堡一带。黄昏时分，战斗打响。经1天1夜激战，当第二天启明星高高挂在天空时，粟裕指挥部的电话里传来了消息：

宣家堡敌人被全歼。

宣泰战役中，赋予6师的主要任务是攻克泰兴，并协同友邻部队阻击可能由靖江、口岸来援之敌。

13日21时，进攻泰兴的战斗打响。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十分惊慌。战至14日晨，我6师扫清了外围，逼近城垣。城内的敌人依靠城墙进行顽抗，大炮、机枪从城头上向我军猛烈地轰击、扫射。经过1天的紧张工作，各团都完成了攻城准备。6师首长王必成与江渭清立即下达了当日18时开始攻城的命令。

此时，敌已判明我主力在泰兴、宣家堡一带，即令其主力向泰兴、如皋进攻。

华中野战军首长在获悉这一情况后，鉴于宣家堡、泰兴守敌基本被歼，果断地决定：6师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残敌，造成敌人的错觉，使其误认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主力则立即挥师东进，另选歼敌战机。

至此，宣泰战斗胜利结束，歼敌3000余人。

宣家堡、泰兴战斗，是我军乘敌处于进攻前夕，疏于戒备的情况下进行

的，打掉了敌人的中路，扩大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为转移兵力、连续作战创造了条件。

接着，粟裕又指挥我军连续六战，连战皆捷。苏中七战七捷，共歼敌 5 万 3 千人。

消灭“天下第一旅”

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陆军整编第 1 军第 1 师第 1 旅，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也是“西北王”胡宗南发家的本钱。全旅一式美械装备；士兵都是深受反共宣传影响、兵龄均在七八年以上、训练有素的老兵；旅长黄正诚中将，是希特勒德国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军衔在同级军官中为最高，被国民党军界吹嘘为“百战百胜的将军”。

抗日战争一结束，胡宗南就以他的精锐部队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猖狂进犯晋南解放区。陈赓此时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 纵队司令员，他和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深知这个“关中坐大”的常败将军亦是“牛皮将军”，早就想给他和他的宠儿——“天下第一旅”一点颜色看了。

1946 年 9 月，在闻喜、夏县挨了陈赓第 4 纵队一顿揍的胡宗南将主力向北开进，准备与阎锡山南北夹击陈赓纵队。9 月 22 日，胡宗南以 2 个旅的兵力攻占了我军的浮山阵地。正当敌人得意时，陈赓很快捕捉到战机。他用一部分兵力对占领浮山的敌人实施佯攻，以此把集结在临汾的敌第 1 旅调动出来，再把我军主力隐蔽集结在敌意想不到的临（汾）、浮（山）公路以北较为平缓开阔的地域，争取在增援之敌运动途中将其消灭。他的具体部署是：以不足 1 个旅围歼已进至官雀的敌军第 1 旅 2 团，以 1 个旅切断敌临汾与浮山的联系，以 1 个旅阻浮山之敌西进，太岳军区部队牵制浮山守敌，另以 1 个团对集结于临汾的其它敌军进行牵制。陈赓这样部署兵力确实是需要有胆略和魄力的，因为其中 4 纵真正与“天下第一旅”直接较量的只有 2 个旅了，这只是毛主席提出的打歼灭战的最低兵力基数；且陈赓纵队在临（汾）、浮（山）一线作战，很可能被胡宗南的重兵东西夹攻，而陷入危险境地。

然而，久经沙场的陈赓，经过一系列分析判断，相信这次围歼战定能成功。这时，他显得非常兴奋和自信，对周围的同志们说，7 月在闻喜、夏县歼灭第 31 旅时，我就想干掉第 1 旅，没想到它滑头得很，只让我们咬了一口，丢掉了 1 个营，这次看它还有什么戏唱。

果然，在我军对攻占浮山之敌进行佯攻时，胡军第 1 军军长董钊和第 1 师师长罗列即命令最精锐的第 1 旅前去救援。

22 日夜，第 1 旅的第 2 团气势汹汹开进官雀村。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官雀村就被陈赓纵队的李成芳第 11 旅围住了。当夜战斗打响，在双方激战时，陈赓纵队第 13 旅在本身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主动向第 11 旅靠上去，协助歼敌第 2 团。

敌第 1 旅第 2 团团团长王亚武是胡军中有名的“猛张飞式”的所谓“虎将”，所属官兵确实也很顽强。战斗空前激烈，从 22 日夜打到 23 日白昼。我军突入官雀村，对敌人分割包围。守敌死命抵抗，与我军逐房逐点地争夺。双方伤亡严重，我军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时，中央军委给陈赓第 4 纵队下来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歼灭第一旅”。陈赓当即把命令传达到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并明确指示李成芳调整部署，加速解决官雀的

敌人。中央军委的决心鼓舞了每一个指战员。当天接近黄昏时，第 11 旅向顽敌发起总攻击，战士们勇猛地向敌人扑去，用连续爆破的方法一层层打开敌人赖以抵抗的阻隔。用刺刀与敌展开肉搏，逐渐向敌人团指挥部逼进。24 日凌晨 3 时，我作战部队彻底解决敌第 2 团，其团长王亚武被击毙，“虎将”成了“死将”。

“天下第一旅”的一条粗胳膊被砍了下来。

在围歼敌第 2 团的同时，消灭第 1 旅旅部及其第 1 团的战斗也在进行着。

第 1 旅旅长黄正诚得到王亚武团被陈赓纵队包围在官雀的消息后，立即奉命率部和所属第 1 团前往救援。我军从无线电收发报机中得知敌人的行动，陈赓不禁大喜，于是命令担任切断敌人与临汾联系任务的周希汉第 10 旅，在敌救援途中的陈村一带阻击，并创造条件歼灭敌人。

旅长周希汉从纵队指挥所受领任务回去后，立即按陈赓司令员的指示部署兵力、构筑工事，积极进行战前准备。23 日凌晨，敌人从临汾出动，周希汉即派出几个机动小组，与敌人接上火，然后边打边撤，诱敌上钩，直把敌人引到第 10 旅的阵地面前。待敌人接近阵地时，我隐蔽着的主力部队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不久，挨了打的敌人开始组织进攻，从早晨一直到下午，敌人连续进攻 10 多次，均被我击退。起初敌中将旅长黄正诚根本不把面前的我军当回事，他与师长罗列通话时还大大咧咧地说：“土匪骚乱，不足挂齿，师座尽管放心”。战斗一直打到傍晚，他才算清醒了点，可是这时天色晚了、战机也晚了。为了寻找依托，防止在野外被围歼，黄正诚急令部队就近退缩到陈堰村，企图以村为依托，形成堡垒据守。然而，黄正诚万万没有想到，他前脚进村，行动迅捷的陈赓纵队后脚就跟了过来，不但把陈堰村包围住了，而且紧“跟”进了村子。从西面进村的第 29 团 1 营 1 个连，进村就缴了 200 多名敌人的武器，懵懵懂懂的敌人还以为发生了误会，拚命叫“自己人，自己人”。

从 22 日夜晚围歼官雀村敌 2 团开始，陈赓一直在作战指挥部里，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注视临汾和浮山敌人的动向。23 日，他同时指挥官雀和陈堰村方向的两个战场，他及时向两个战场通报对方的战斗进展，要李成芳旅长尽快消灭官雀守敌，同时命令周希汉无论如何都要顶住黄正诚，以便造成李成芳旅作战的有利条件。当黄正诚龟缩到陈堰村后，陈赓立即下决心趁势歼灭敌人旅部和第 1 团，并明确指示周希汉

“要活捉黄正诚”。

入夜，围歼陈堰村之敌的战斗开始，第 10 旅的部队像瀑布水泻般地一往无前，从四面八方涌进村子。敌人仗着精良武器装备竭力顽抗，用大量机枪形成防御火网，对我进攻部队实行反冲击，甚至用火箭炮开路，企图突围。第 10 旅指战员不断打退反扑，及时弥合缺口，并对顽敌进行包围、对进、穿插、分割，勇敢的战士们用炸药包、手榴弹和刺刀一块一块地“啃”，一间房屋、一个院子地争，终于在 24 日凌晨把黄正诚和部分敌人死死包围在几个院子中。黄正诚成了瓮中之鳖，他梦想坚持到天亮，等待援兵来救命。陈赓命令周希汉一定要在天亮前结束战斗，于是第 10 旅官兵再鼓士气，集中全旅的火器兵力猛攻黄正诚旅部。敌人丧心病狂，对我军施放毒气，企图挽救败局，可是攻击部队前仆后继，冲向敌人据守的墙院。在最后一个大院里，敌

人在我军火力的猛烈打击下，终于全部缴械。

至此，胡宗南吹嘘的最精锐的“天下第一旅”全军覆灭。穿士兵服企图蒙混过关的“百战百胜的将军”黄正诚，直到被押走时，还搞不清自己是如何进入陈赓的圈套自投罗网的，仍在十分不服气地嘟嘟嚷嚷：“你们打仗不守规矩……偷偷摸摸，不按操典，乱冲乱打……”。

医院里的“司令部”

寒风冷雨给苏北带来了1946年。

睢宁县大李集往北去的路上，农民支前的车轮滚滚。小推车嘎吱嘎吱的声响汇成了声势浩大的交响乐，轰鸣着涌向徐州战场。

大卡车无法向堵满小车的路上开去，靠着镇口土墙停放在了坡上。

“为什么停车？不知道任务紧急吗？赶快向前开！”卡车上挤得满满的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急着赶到前线去开设指挥部，不由得拍着驾驶室的顶篷盖喊了起来。

“不能开”。驾驶室里传出张爱萍副司令员的声音：“等前面的小车走了再开”。

车上边的人听说要等，就想下车。张副司令员打开车门，把头伸出来喊：“不要下车！派一个人去买吃的东西。路一通，我们马上就……”话没说完，突然没有了声音。

“不好！”作战处长孙公飞探头一看，大叫了一声。原来是汽车在泥泞中顺坡下滑，蹭在墙上，车门把张副司令员的头夹伤了。旧棉帽的后边已经被血润湿了一片，硬帽檐都轧碎了。

驾驶员一看这样，急忙换闸要倒车，好把车门松开。

“不能倒车！”孙处长一边吼着制止驾驶员，一边和军区组织部长谢胜坤纵身跳下车，指挥着车上的人都下来向后推车。看到张副司令员被解脱，才对惊慌失措的驾驶员说：“你要倒车，就要启动。一启动，车向前哪怕再近一点，非挤碎不可！”

昏迷过去的张副司令员在卫生部部长的救护下，过了20多分钟才渐渐苏醒过来。他慢慢睁开眼，看到同志们都关切地围着自己，汽车还停在那里，挣扎着要起来：“车要马上走！”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责任。李宗仁手下大将李品仙正带着2个师的“国军”从蚌埠北上，要赶在国共停战的“一月协定”前打通津浦路，强占徐州。为了堵截李品仙，粉碎国民党的这一阴谋，华中军区决定让他率王必成和张震2个纵队和1个旅、1个骑兵团归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在徐州南线展开阻击作战。前线的部队正等待着他，他心里能不着急吗？眼见自己负伤又耽搁了时间，所以连连催促：“要赶快走！”边说边爬起身要上车去。可还没站起来，又晕厥倒了下去。

卫生部长说：“伤得这样重，不能再走了。”

“那，怎么办呢？”作战处长心如火焚，急得直骚头皮。

“听我的，走！”王部长招呼人用担架把张副司令员抬到大李集的野战医院。

到了医院后，张副司令爬不起来了。陈老总的指挥部在徐州北边，整个战役的计划都是拟定好了的，耽误不得。“唉！”他无奈地捶了一下担架：“架设电台，我就在这里指挥！”

电台从车上搬了下来，野战医院里开设了南线司令部。

“立刻和各方面沟通联络，我要马上得到战况。向陈老总和军区报告我的位置，但是，不要讲我受了伤。”

“是！”作战处长答应后，又犹豫起来：“可……”

“绝不能因为我影响整个战役。”张副司令员挥了挥手，斩钉截铁地说。

部队按照电波传来的命令在大范围的运动中与敌人开始了拚杀。气势汹汹的李品仙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阻截和打击，恼怒地督促他的常胜军更加疯狂地扑上来，同时又暗暗佩服对手用兵的神妙。可是，这位久经沙场的赫赫战将，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与他对阵的主将正躺在医院里，忍受着严重伤疼在运筹整个的战争。

大李集野战医院里，张爱萍的思维正驰骋在整个的战场。他静静地听着作战处长报告的每一个战况，细细地询问着敌我双方的每一个变动，默默地想着敌人可能的动向和我方要采取的对策，然后，将经过深思熟虑的对部队行动的命令口述给作战处长。

孙公飞在记录着首长的决心，首长对部队、对地理的熟谙使他叹服不已。只要一对他部说部队现在哪里哪里，敌人在哪里哪里，他就都明白了。对地形、地貌、村镇、河流、道路、桥梁……都了如指掌，说得和军用地图上一样，准确无误。所以，竟情不自禁地瞪着一双惊愕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厮跟多年的首长。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看到他这种神情，张副司令员问。

“啊……没有，完全对”

“你再去核对一遍。战争非同儿戏。”

其实，在每次口述命令前，他不知已经在心里核对了多少遍。他熟知苏北，不仅是因为和日本侵略军格斗中在这里纵横过，把握天时、地利是指挥官的本色；更重要的是这里凝聚着他的爱和恨、理想和深情。从最初开辟这块根据地始，他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直是兢兢业业献身于这块天地里的事业。

3天以后，仗打得激烈了。他不顾卫生部长和医生们的劝阻，坚持在听完战况后要爬起来自己写电报。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撑持起肿胀得很厉害的头，握牢笔，一撇一捺写起来。每写一笔，就像有无数的钢针在他脑子里乱刺。只好停一停，再咬着牙往下写。豆粒大的汗珠扑扑簌簌从额头滴在电报纸上。

孙公飞这条铁铮铮的硬汉，在接过电报时，也禁不住热泪横流了。但是，他懂得首长的心，用巴掌抹去脸上的泪，大步向电台走去。

一份又一份电报，把将军坚韧的意志变成了部队强劲的行动；把将军晶莹的汗珠化作了飞旋的枪弹。整个战场，在按照将军一撇一捺的布置，顺利地向前发展。

3天，5天，7天，9天，李品仙的两师“国军”冲不破钢铁的防线，在沉重的打击下，龟缩南去了。

南线的阻击，保障了北线的胜利。

第10天，当作战处长兴高采烈地送读陈老总拍来的祝捷电报时，张副司令员肿得斗大的头艰难地转动了一下，青白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肖华智擒“千里驹”

1946年10月19日，敌人调集8个师（约10万兵力），从沈阳地区出发，分三路向我南满地区疯狂进犯。

当时，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占有很大的优势。论兵力，敌人先后出动8个师，共10万之众；而我4纵队只有3个师，并且其中1个师在永陵、新宾地区配合3纵队作战。论装备，敌人不仅有美械轻武器装备，而且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等配合；而我军装备主要是轻武器。

所以，敌人十分嚣张，向我侧翼迂回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5师，扬言他们有在缅甸作战经验，自称是所谓远征军“千里驹”师，趾高气扬，其势汹汹。

10月20日，沿安沈线正面推进的敌人已逼近我12师防守的连山关、摩天岭、下马塘等阵地；向我侧翼迂回的敌25师先后侵占小市、碱厂等集镇，并向我赛马集打来。面对强大凶恶敌人的步步逼进，怎么办？是走还是打？4纵首长颇费思量。

此时，如果4纵退到宽甸以东，我辽东军区和后方党政领导机关的转移就要受到严重威胁（当时鸭绿江并未封江，没有船是过不去的），安东至辑安沿滔滔鸭绿江一侧的我后方医院、工厂和家属、孩子的安全也要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会打乱我军战略撤退的部署，招致严重后果。要打，又有一个背向南还是背向东，是正面阻敌、保守城市和地方，还是转到敌人侧翼、伺机歼敌有生力量的问题。背向南正面迎敌，势必全线应战，分散兵力，于我不利。背向东，可利用地形造成对我之优势，同来势汹汹的敌人较量；但必须咬紧牙关，克服兵力分散的困难，步行200多公里，迅速转移到赛马集以东地区集结。

打击向我宽甸地区进犯的国民党军25师，是4纵领导考虑的重点。“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当时，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深感责任重大，深知此时决心的份量。4纵党委决心在赛马集、新开岭地区给敌25师布置口袋，诱它长驱直入，投其所好。

我军当时的部署是：12师除用1个团（即35团）由芦燕秋副师长率领在连山关至凤城正面边打边走，掩护安东党政机关转移外，12师从阵地撤下来，主力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别由桥头以南至摩天岭、连山关地区，星夜向赛马集以东邵家堡子地区转移集结；第11师31团在分水岭阵地设防，坚决阻击敌25师，以争取时间，掩护12师主力及纵队直属队向新开岭地区转移。

赛马集是辽东重镇，也是通向安东的交通要道，是敌第25师要夺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在分水岭遭到我31团阻击的敌25师，经过两昼夜的激战，仍未能突破我军阵地。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炮火，又一次向我阵地发起了一次猛攻。10月23日，敌人突破了我军防线，迅速占领了赛马集。趾高气扬的敌人，除留两个营防守赛马集保护本溪侧翼外，主力则火速向凤城推进，目的是直取我辽东军区所在地，引我主力进行决战。这时，其他两路敌人也向我安东地区靠拢，而本溪、抚顺等敌军的后方则无多少兵力了。

这时，我11师和12师已按照预定的计划在赛马集东北会合，背后已无后顾之忧。为了把敌第25师主力拉回来，引向新开岭歼灭之，趁赛马集敌人立足未稳之际，果断地集中我纵队两个师共5个主力团，加上纵队炮兵团，向赛马集靠近，以五比一的优势兵力，于24日深夜，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向

驻守赛马集之敌发动了猛攻。

顷刻间，赛马集枪炮声大作，夜空里杀声四起。驻赛马集的敌人万万没想到，我军能如此迅速地集中这么多的兵力投入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25日黄昏，我纵队重占赛马集，击溃守敌两个营，俘敌300余名。我纵队士气大振，初步尝到了集中优势兵力的甜头。

4纵队收复赛马集，使敌25师失去了后方依托；空虚的本溪、抚顺又暴露在我主力的面前。正向我凤城、安东推进的敌25师得到赛马集失守的消息，立即转回头来救援。当时，纵队指挥部分析了形势，认为如果在赛马集一带与敌决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应选择更有利的地形，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一个更漂亮的歼灭战。为此，决定放弃赛马集，力争把敌人引至赛马集西南30余里的狭长山谷地带，在运动中再吃掉它一两个团，扩大战果，为全歼25师提供有利条件。

于是，4纵队主力集中于双岭子地区，与敌回师赛马集的先头部队接上了火。但是，出乎我军的意料，战斗打得很不顺手。找来一个俘虏审问，才知道原配属52师作预备队的敌75团已归还25师。这样，原估计敌人回援的两个团，最多不超过5000人，现在却是3个团8000多人，而我现有兵力总共1万多人，装备也落后。显然我军不占绝对优势，如果再打下去就得不偿失了。敌变我变，纵队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离双岭子，继续按原计划向新开岭方向转移；同时让11师与敌人保持接触，沿公路一线节节抗击，边打边撤，诱敌深入。

敌25师重占赛马集后，急于寻找机会与我主力进行决战。得意忘形的敌师长李正谊，急于创立战功，不顾一切向新开岭追击而来，妄图抢占宽甸，在鸭绿江边吃掉4纵。这时，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率第10师，日夜兼程赶到新开岭地区参战。这样，4纵队的兵力达到了一定的优势。

分水岭设防阻击，保障了我12师主力及纵队直属部队的安全转移；赛马集初战取胜，打乱了敌人妄图迫我在凤凰城至安东地形决战的部署；双岭子主动转移，巧成诱敌机遇。骄横自大的敌人始终摸不清我军虚实，猜不透我军真正意图，就好像同影子搏斗一样，正所谓“敌据若虚”，行动无所依据，只好乖乖听我调动，被我军牵着鼻子走。最后于10月30日被我军诱到预定歼敌战场——新开岭地区。

新开岭位于宽甸西北（凤城县境内），四周高山重叠，正是歼敌的理想战场。

31日上午5时，4纵队隐蔽集结在新开岭地区的8个团，兵分三路，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击。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对敌人形成了袋形包围。

由于敌军退路被我切断，开始作困兽犹斗；敌人把主力集中在师部所在地老爷岭、黄家堡子附近，并组成一个3000人的反冲击部队与我争夺，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我正面攻击的第10师28团先后组织了7次冲击，均未成功。当时在老爷岭碉堡附近，已经密密麻麻地趴满了我军战士，有的离碉堡只有十几步，但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上不去。怎么办？

此时，辽东战场上其它各路敌人已出现在我纵队后方；东路敌人逼近通化；西路敌人进到庄河、大孤山；中路敌人已占领安东、宽甸；敌增援部队新六军22师，也赶到了双岭子附近。

情势十分危急！

老爷岭战斗的成败，关系整个战役的前途。

在这紧急时刻，胡奇才司令员决定实施战术上的集中兵力，将纵队预备队 30 团用上去，并调动所有炮兵，集中火力猛打老爷岭。

战斗中，10 师作战科副部长段然毅然挺身跃起，举起手枪，高声喊着“同志们，冲啊！”带头向敌人碉堡冲去。我指战员在段然带动下，不怕牺牲，猛打猛冲，一涌而上，一下就把敌人冲垮了。28 团五连副连长王喜芹带领 4 名战士，率先抢占了敌人碉堡。28 团和 30 团以及 29 团的指战员们很快攻占了老爷岭阵地。敌人失去老爷岭这个最后的依托阵地，像惊散的羊群，四处逃窜，乱作一团，妄图向赛马集突围，当即被我 11 师、12 师堵击。

正在此时，敌沈阳空军飞机到敌师部黄家堡子驻地给 25 师空投的弹药、物资，然而，大部分降落在我军刚占领的阵地上。蒋介石成了名副其实的“运输大队长”。

战役发展至最后阶段，敌人的垂死挣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敌军官残酷地把自己的伤员和汽车、炮弹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

敌人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丧魂落魄，纷纷缴械，举手投降。我军一个班竟俘虏几百人，蒋介石豢养的这个狂妄自大的所谓“千里驹”，终于遭到了全军覆灭的下场。到 11 月 2 日上午 10 时左右，敌 25 师全部被歼，25 师师长被俘，新开岭战役胜利结束。

新开岭战役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首次歼敌美械装备的一个整师，狠狠打击了敌人疯狂进犯的气焰，打乱了敌向临江、辑安进攻的计划和“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保障了我辽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人员、物资的安全转移。

回戈一击歼敌旅

1946 年 10 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领下，遵照党中央命令，出击陇海，南线作战。用杀回马枪的战术，在鲁西南的鄆城战斗中，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人的 1 个旅又 2 个团。

1946 年 10 月中旬，敌王敬久集团军的 5 军、11 军等部，由金乡北犯巨野。下旬，我军奉命由鄆城西南向巨野运动。

10 月 28 日夜，我军分数路向东南方向前进。一连行了 3 个小时军都没休息，大家很累，议论开了：“大概离巨野不远了吧！”“可能很快就要进入战斗地域！”11 点左右，前边队伍突然停止前进。旅司令部传来命令：各团立即向后转，以最大速度向鄆城方向前进，部队急行军，赶在黎明前穿过了鄆——荷公路，在公路西 1000 米左右的一个村庄里集结待命。并按上级指示，立即严密布置警戒，封锁消息，不准村里群众外出，并迅速构筑掩体、工事。

各项战斗准备刚刚就绪，29 日下午，老远就听到了敌坦克、汽车的隆隆声，敌 119 旅开过来了。

刘、邓首长用兵如神，这一切安排得多么巧妙！成千成百的敌人，一批一批地开到鄆城南十里外竟不动了，都在我们早已设下的大包围圈里（即高魁庄、任庄、崔庄一带）宿营。本来刘、邓首长是要声东击西，作出与 5 军决战的架势，迷惑敌人，而以主力西进濮阳寻机歼敌。行进中得知敌刘汝明 119 旅和 29 旅 1 个团在 119 旅旅长刘广信统一指挥下由荷泽沿鄆——荷公路冒犯鄆城，刘、邓首长于是撇开强敌，拣弱的打，命我东路部队回马一枪，

杀向鄆城，围歼刘广信部。

29日傍晚，战斗首先在鄆城南面的高魁庄打响。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我军接连攻克高魁庄、富春、苏庄、任庄等敌占村落，将敌人3个团大部歼灭。31日中午，崔庄、古庄之敌在刘广信率领下，乘大雾向白衣集方向逃跑。2纵5旅是整个战斗的总预备队，听到前面机枪、手榴弹打个不停，都急于出击，但上级却始终不下达冲击命令。31日中午时分，东边枪声密集，黑压压的敌人越过鄆——荷公路向我们防守的地带突围过来。可是，敌人连做梦也没想到，我军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当敌群到达我火力控制地域后，我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把敌人一批批撂倒在阵地前沿。打退了敌人第二次反扑，敌人3架飞机临空，但由于敌我双方距离很近，敌机投弹不成，扫射不敢，只好无可奈何地飞走了。敌人又由荷泽方向沿公路开过来12辆坦克。行至我阵地正前方，突然左转弯离开公路向西驶来，密密麻麻的逃敌围拢在坦克附近。我所有部队的机枪立即一起向敌群射击，敌人又一批一批地倒下去。随后，团下达冲锋号令，各部队跃出工事，从十多个方向勇猛地向敌人冲杀。冲击中，八二炮连火箭筒班班长关金保同志，提起一具在平汉战役中缴获过来的美式40火箭筒，一跃冲出100多米远，占领有利地形，对敌坦克群一连发射了5发火箭弹，将敌4辆坦克击毁。其余8辆坦克吓破了胆，慌忙打开顶舱盖举手投降。敌119旅旅长刘广信也被我活捉。这次战斗，敌119旅及1个团9000余人全部被歼，仅13团在此战斗中即俘敌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百挺。战斗结束后，领导机关给火箭筒班班长关金保同志记大功一次。

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对鄆城、濮阳的进攻，又一次打乱了敌人进攻的计划，在晋冀鲁豫野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成武三战易县

1946年秋，敌人占领张家口以后，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叫嚷：“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全以军事解决问题”。

于是，敌第94军气势汹汹地向我根据地易县杀来。

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杨成武：率领第3纵队第8旅和独立独4旅、独立第8旅还击向易县进攻的敌第94军，保卫易县和紫荆关。

易县，古为燕国之地，秦时荆苛刺秦王，就是从易水出发，前往秦国的。因此便有了那凄哀悲绝的千古诗句：“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易县位于涞水、满城、涞源之间，东临平汉铁路，西接晋察冀解放区，是解放区的咽喉要地，也是阻敌西犯我解放区的屏障。这些年来，易县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8年抗日战争期间，这里的战火始终没有熄灭过。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对易县垂涎三尺，企图在侵占易县后，西击紫荆关，与察南之敌东西呼应，把我解放区分割成南北两部分，陷我军于不利地位。

这是我军撤出张家口后，敌我双方主力第一次交手。撤出张家口这一战略决策，在一些同志的心理上不是没有一点震动，也不可能很短的时间里所能透彻理解的。如今，我军不会也不能再往后退了。为此，必须在保北三角地带与敌人进行一场厮杀。

按上级指示，部队很快集结起来。杨成武一看，发现有1个旅的旅长和政委都没有到，部队由副旅长和副政委带来。大敌当前，主官不上前线，这是不能允许的。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杨成武懂得，部队要想打胜仗，就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没有纪律、纪律松懈的部队，是一盘散沙，是经不起严重考验的。第3纵队刚组建不久，毕竟还很嫩，需要整顿，需要加强纪律观念。

打一两个胜仗容易，而要培养一支能够经常克敌制胜的铁军，确是相当不易的。当前，我军面临着的就是一个考验：如何战胜美械装备的第94军。杨成武经过再三思索，认为这两位虽然都是老同志，经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有功，但在这个时候必须严明军纪。军区首长给了他们必要的处分，杨成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

处分决定传达后，杨成武对全纵队营以上干部讲话：

“不积极，不坚决执行命令的，不完成任务的，不仅要总结教训，还要给予必要处分。”

此事对部队震动很大，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对存有畏葸不前思想的极少数人，也及时地敲响了警钟。这一行动，对于第3纵队纪律、作风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指战员群情激奋，盘马弯弓，积极备战，准备杀敌。

11月3日，敌121师第361团继续西犯，当晚被我独8旅诱至南北桥头、二十里铺、门墩山等预定地区，遭第3纵队主力阻击，被迫停止前进，龟缩在上述各地待援。这时，第3纵队独7旅已按预定计划进到南北秋兰地区，摆好两面防御的阵势，阻敌援兵，断敌退路。敌人1个完整的美械化团，已完全落入第3纵队布下的天罗地网。

敌人想跑也插翅难飞了。

杨成武立即命令独8旅、独7旅1个团和独4旅，乘敌立足未稳，立即行动，于当日晚向敌发起进攻。

敌人的美械装备果然名不虚传，火力很强，一发现第3纵队进攻，各种火器同时开火，只见夜空里到处闪耀着照明弹的亮光，闪烁着曳光弹划下的道道弧线，到处都是炮弹爆炸时耀眼的白光。步枪声、机枪声、炮声交织在一起，就像平地骤起的狂飙。

激战竟夜，至次日9时，敌人1个美械化团和1个美械化营，终被第3纵队干净利索地歼灭掉，2600余人无一漏网。缴获各种火炮20门、轻重机枪79挺及大批步枪、弹药；还击毁坦克、汽车各一辆。

在灿烂的秋阳下，部队押着两千余俘虏，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1月中旬，敌人集结10个团的兵力再犯易县。11月16日晚，杨成武的第3纵队和第2、第4纵队及独立第1旅，对进至门墩山、二十里铺地区的敌第94军4个团发起攻击，共歼敌美械化部队3800余人，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敌人仓皇东撤高碑店、定兴一线。

敌人两犯易县，在我军的打击下均没达到目的，很是于心不甘。在门墩山战斗结束后不到1个月，又于12月16日三犯易县。

敌人这次进攻的部署是：一路是第94军，由北面高碑店、涑水出动，另一路是第53军和暂编第2总队，由南面保定出动，作为对94军的策应。

12月19日，敌第53军130师388团前出至后大留，389团进至大马房一带，第2总队两个团进占相庄、东营、道口3个紧挨在一起的村庄。这两支部队成了敌53军主力伸出来的触角。

针对当面敌情，军区命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及独立第

7旅、独立第8旅，迎击敌军。杨成武即刻部署，于20日黄昏，对敌388团发起攻击，把敌人压向村内。借助照明弹，杨成武极目望去，但见我军指战员在和敌人激烈搏斗。村落里每条街每幢房屋都成了战场，到处杀声连天。这场厮杀一直进行到拂晓才告沉寂，敌人终于被我军全歼。

这次战斗，毙敌400余人，俘敌少将团长佟道以下2200余人，美械化388团全体官兵无一漏网。这是我3纵队继全歼美械化361团后全歼的第2个美械化团。

当后大留战斗胜利结束时，我第4纵队也于相庄、道口、东营歼灭了敌暂编第2总队两个团的大部。

遭此打击后，南线敌军缩回保定，北线的敌第94军也龟缩在涑水地区未敢妄动。敌人第三次进犯易县又被我军击退。

全军开展立功运动

立功运动，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过去创造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的基础上，对政治工作的一种新的发展。这一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首创的。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新四军第1师第2团的多数连队建立了功劳簿，目的是为选举英雄模范积累材料。

1946年8月，在参加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为了激励士气，该团政治处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的口号，部队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功劳簿很受战士欢迎。

9、10月间，两淮失守后，我军暂时处于被动状态，打或走任务变换不定，部队政治工作难以提出明确的口号。因此，在任务多变、打或走不定的情况下，急需找到一种能随时应付打和走，平时能巩固部队战斗士气，战时又能顺利投入战斗动员的政治工作方式。

10月8日，第2团领导研究决定，在“功劳簿”的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功劳运动。

随后，党的总支委员会向党员发出“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首建头功”的号召，团政治处提出了“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的口号，并建立了“三证”制度。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规定工作调动时，功劳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连队有一个“功劳簿”，叫作部队光荣，永远光荣；给家里发个“功劳状”，叫作一人立功，全家光荣。这样，全团很快掀起了功劳运动的热潮。

时隔两天，山东军区和地方政府也于10月10日联合发布命令，公布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1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介绍在山东和华中正在开展的立功运动的经验，称赞这一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阐述在全军和各解放区以至敌后游击区推广立功运动的重要意义，要求全军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作为夺取全面胜利的有力武器。

全军热烈响应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这一运动。12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发表“所有连队把功劳簿建立起来”的社论，号召“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和晋绥等战略区，也都作出了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和指示。

与此同时，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也及时总结两个月来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发布深入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并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不少部队在开展这一活动中，还提出了“有了功劳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的口号，要求指战员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竞赛，发扬团结互助友爱、虚心学习的精神，进一步熟练掌握各种武器，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与工作效率，增强战斗力。

到1947年初，立功运动在全军普遍展开，形成为热火朝天、气壮山河的群众运动。

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社论指出，从去年苏鲁皖部队首创立功运动以后，全解放区部队机关已经普遍推行，这一运动显然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运动的方式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社论号召各战略区把这一运动继续深入下去，使这种以表彰先进为主的群众性的革命英雄主义竞赛更加制度化和普遍化，成为提高全体指战员阶级觉悟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法。

立功运动的产生和广泛开展，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逐渐形成为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炮打聊城

1946年初冬的一天，正在长台县北面的王村办炮兵训练队的张量同志突然接到二野李达参谋长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司令部来接受新任务。当他气喘吁吁跑到李达参谋长的住屋时，已经有不少同志坐在那里了。李参谋长见参加会议的同志已到齐，就说：“把大家请来，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交给你们一个新任务……”。大家一听说刘、邓首长交给了新任务，情绪十分热烈，争先恐后地问：“什么任务？”李参谋长习惯性的右手拿着铅笔，有节奏地拍打着左手，微笑着说：“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你们就急着问！”接着话锋一转，严肃地说：“鄄南战役，我们缴获了敌人新式美制榴弹炮8门、山炮7门，还有其它一些炮和轻重武器。刘、邓首长决定，用缴获敌人的这些炮，加上我们原有的炮，组建1个榴弹炮团。决定调张量同志任炮团团长，梁克诚任参谋长，韩峻、王浩同志任参谋。”李参谋长又说：“战斗中，我们还俘虏了86名炮兵人员，都有一点炮兵技术，编入你们炮团，要加强教育，由杜友芳参谋负责。各纵队抽调的人员马上就要到，你们立即回去着手筹建吧。”

榴弹炮团组建后全团上下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12月17日下午7时，炮团接到李参谋长的电话指示：“命令炮团带两门炮、20发炮弹参加打聊城战斗，于12日晚出发，由司令部汽车牵引，到八里庄待命。”又说“这次战斗配属一纵行动，服从杨勇司令员指挥。”第二天，他们正准备行动时，李参谋长又来电话：“派人前去看阵地。”张团长当即派副队长王浩等同志，前去勘察阵地和找杨勇司令员，接受具体任务。经过临战前的紧张准备，12月26日随一纵疾速向聊城方向开去。

聊城是座东西短：南北长的小县城，座落在我通往根据地的要道上，加

之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敌人极为重视，派了近两个旅的兵力驻守。他们在城墙上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城内也到处是明堡、暗碉，还在城周围开挖了一条深二米、宽十几米左右的护城河。为了摧毁敌重要防御工事，为步兵开辟攻城道路，杨勇司令员亲自指挥我们选择炮阵地，并指示炮兵要先打东门，然后再打南门，重点轰击城堡和工事。随着攻城命令的下达，炮弹怒吼着在敌人阵地、堑壕、城楼上爆炸，击毁了敌指挥中心——钟鼓楼，轰垮了城门附近的敌工事。平时要几个人才能推动的城门，也歪斜在墙边上。但是，城堡里的敌人，还在负隅顽抗，我步兵仍被阻在城外。杨司令员当机立断，命令将两门炮调到城南门，重点轰击敌工事。由于城周围是开阔地，敌人设有路障，拉炮的大卡车无法通过，驾驶员王希巨冒着弹雨开着中吉普，把炮拉到射击位置。随着几声巨响，城南门敌人的工事和顽抗的敌人一起被炸飞了，在炮火的有力掩护下，各步兵团队发起了冲锋。经过激烈的战斗，第二天拂晓解放了聊城。炮兵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步兵老大哥见到炮团，总是带着赞誉的口气说：“有了我们自己的火炮，打起仗来又带劲又热闹。大炮一响，我们冲锋的劲头更足了。”

司令员“剃”头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一次，彭德怀同志到医院看望伤病 150 员，见一些头部负伤的战士因为头发长，包扎和手术起来很不方便，有的还因此引起伤口感染。为此，他向部队机关下了一道带头剃光头的命令。

机关大多数同志都痛快地执行了命令，但还有少数爱美的年轻人怕难看，一下子下不了决心剃光头。这事让彭德怀知道了，立即命令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紧急到广场集合。彭德怀站在队前，先脱掉自己的帽子，露出已经剃光的头，然后命令大家“脱帽”。随后，他把握着理发推子的手放在身后，走到队前挨个检查，看到谁的头还没有剃，就上去给来一推子。

检查完毕，彭德怀站在队前，给大家讲了剃光头的必要性。他说：“同志们，我们是野战军，现在又处在非常时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随时都有流血负伤的可能，要求大家把头发剃掉，不但可以整肃军容风纪，更重要的是，万一脑壳负了伤，便于治疗。”他又提高声音问道：“今天我搞了个突然袭击，自己作主给你们剃了头，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大家响亮地回答。

“解散”命令一下，干部战士们憋了半天的笑声马上在广场上回荡，大家都夸“一号首长”办事干脆利落，挨了一推子的同志，也愉快地找人剃光头去了。

王克勤运动在全军开展

“王克勤运动”，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以晋冀鲁豫军区某部排长王克勤所创造的以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三大互助活动”为基本内容，在全军开展的团结互助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的重大发展。

王克勤，安徽阜阳人。1939 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受尽压迫虐待。1945 年 10 月，他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随后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 6 纵队 52 团 1 连 1 排。王克勤获得新生后，经过人民军队的生活，特别是诉苦运动，思

想觉悟迅速提高。他又亲自看到解放区人民，过着自由幸福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更激发了他的阶级觉悟。特别是在他生病的时候，连队干部体贴入微的关怀，使他深受感动。他从亲身体会中，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人民军队、蒋管区和解放区进行对比，更觉悟到应该全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底。于是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勇敢地作战，很快成为一个智勇全备的人民战士，不久就当上了班长，并于1946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王克勤便尽心尽力地用他在两种军队中的生活体验，启发解放战士和新战士的觉悟，用自己学到的军事知识，帮助新战士提高军事技术，先后教会13人打机枪。他把全班编成3个互助组，平时互帮互学，团结友爱，作战时实行战斗互助，带领、鼓励战士英勇杀敌。他以亲身经历和“革命靠互助”的格言，创立以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为基本内容的“三大互助活动”，使全班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战士们都感到跟着他打仗，不怕危险，心中有主张。因此，他带领的机枪班屡建战功，成为战斗模范班，被晋冀鲁豫军区树为团结互助的典型。

王克勤自己在战斗中更是十分英勇，从1945年10月至翌年10月，一人就歼敌232人，俘敌14人，缴获步枪8支，9次荣立战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

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党委和政治部发现这个典型后，认为王克勤是团结友爱、互助互学的模范，先后授予他“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和“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决定在全纵队开展向他学习的运动。结果，对提高翻身入伍新战士的觉悟，团结改造被解放的蒋军士兵，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但打起仗来经验不多，解放战士具有一定的战术技术和作战经验，但他们受过反动军队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人民军队心有疑虑。开展“三大互助活动”，正好使这两种战士结合起来，互助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从1946年7月至12月的5个月中，晋冀鲁豫军区补充解放战士就有10多万人，如何改造这些解放战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王克勤开创的“三大互助活动”，在这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第6纵队一次补充解放战士两千余人，由于开展了王克勤运动，一个月中只有3人逃跑。

为了表彰王克勤的功绩，更广泛地推广王克勤团结互助的经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在全区各部队中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

1946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王克勤班的事迹，并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社论充分论述了开展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地推行这个运动。社论号召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与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战士之间，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中、战斗中都能“相互帮助、相互体贴、相互学习、相互督促”。要求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重视学习解放入伍的战士在作战技术上的长处，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求解放战士通过向老战士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提高阶级觉悟。随后，“王克勤运动”在全军普遍开展。

全军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把人民解放军的团结互助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群众性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巩固部队，促进部队的团结，加强部队的建设，完成作战、训练、群众工作等各项任务，都起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7年7月，王克勤在山东定陶战斗中牺牲，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王克勤排”。

